

文字的起源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从文字的定义开端, 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与杨雄的定义, 莱布尼茨、德里达与索绪尔的分野, 以及唐兰、陈梦家的文字学思想。文章认为陶符不是文字, 反驳了文字起源的“约定俗成”说, 指出启动文字的最初社会系统非国家权力莫属。既而分析了对两河流域文字起源做出解释的泥筹理论, 提出经济生活的需要不是文字产生的充分条件, 国家管理机构是文字产生的第一推手。文章分析了商代甲骨文及贞人集团, 进而论证了“文字的孕育很可能是一个漫长期和一个短暂期之结合, 前者是多种视觉符号形式(包括陶符)的呈现期, 后者是文字系统的初创时”的观点。文章还比较了埃及象形文字与中文的构造法, 特别是两种声借方式的差异, 讨论了何以前者能够诱发字母的产生。文章最后阐释了汉字与希腊字母文字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影响, 并指出: 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 口语与文字的并重, 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 文字起源; 泥筹; 贞人; 声借; 字母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4) 10-0004-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kxy.bjshkx.141001

一、两千年定义之争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文字的起源。我们将从定义去破题。与其说这是因循当代学术的习惯, 毋宁说是因为中西先哲在两千多年前就罕见地为我们留下了“文字”的定义, 提供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便利视角。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在其《解释篇》中说:

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 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杨雄(公元前56-公元13年)在其《法言·问神卷》中说:

言, 心声也; 书, 心画也。

《法言》问世于纸张发明前, 故“书”字不作“图书、书籍”解。许慎(公元58-147年)在《说文解字叙》中屡屡说及“书”字“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秦书有八体”, 其“书”的意思显然是“文字”。而“画”可解作

“视觉符号”。故杨雄之“言, 心声也; 书, 心画也”可译作今文“口语是心之声音, 文字是心之画符”。^[1](P28-29)]

以上两个定义的不同已经不是高下之分, 而是正误之别了。显然是晚亚里士多德三百余年的杨雄正确地理解了文字。而造成这一认知差别的, 与其说是二者的能力, 毋宁说是他们各自的母语。用当代学术语言说, 汉字是自源文字, 古希腊文字是借源文字。自源文字起于象形, 它们是被指物的符号, 而非口语的符号。字母文字在文字的谱系中统统是后来的产物。如果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是不错的。但这位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的志向当不囿于雅典城邦, 必在人类与世界。他做出上述定义后紧接着说:

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 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 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 内心经验自身, 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 而且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收稿日期 2014-07-18

作者简介 郑也夫(1950-), 男, 北京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4 —

由此可知，其定义旨在覆盖人类的口语与文字。不幸的是其母语是借源文字，以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播，他无从知道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和汉字。杨雄是幸运的。他虽然亦有自己的局限性——不知拼音文字，但其母语给了他理解文字本源的恰当指引，遂洞悉口语与文字的差异及文字的特殊性质。

不管缘由与运气如何，毕竟在文字的定义上，正误昭然。但二人身后的影响力却天差地别。究其原因，系母以子贵。西方文化自近代后来居上，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传遍东西方。杨雄的先知慧眼不仅不被西人知晓，在其本土竟也尘封。

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的“文字”定义（该书2002年版的定义只字未改）如下：

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这些符号要能灵活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使信息送到远方，传到后代。（周有光撰）

这一定义显然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而非杨雄的思想。

其匪夷所思者二。其一，数典忘祖。固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孔子说：见贤思齐、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在暗示着与其“有教无类”对应的“有学无类”。如他山之玉胜过吾地之石，便该从善如流。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汉字和汉语不可能支持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不要说长期浸淫在汉字中，且有了日益丰富的小学 and 甲骨学的知识，即使是西方的智者只对汉字惊鸿一瞥，便再难深信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定义。这之中最好的人证是莱布尼茨。

以利玛窦为先导的对华传教士们为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的信息。这些远不充分的信息给予欧洲知识界的一大冲击是汉字：偌大的中国各地有自己不同的方言和语音，但是汉字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彼此间的交流；汉字与其所指有直观的联系；中国与日本语言不同，竟然可以通过汉字完成一些交流。听闻汉字的这些特征，环顾与中国面积相仿的欧洲语言文字上的分裂，借鉴汉字创造“通用字符”的想法在欧洲产生。或许

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是第一人。其后的约翰·韦伯（John Webb）认为中国帝国语言是巴别塔混乱之前的人类语言。此种误解更神化了汉字。沐浴这一思想的莱布尼茨（1646 - 1716）在他20岁（1666年）时就矢志借鉴汉字搞出“通用字符”。性格怪异的米勒（Andress Muller）因号称掌握了“中文之钥”而令众人钦佩。1679年莱布尼茨在转给米勒的信中针对汉字提出了14个问题，其中一些颇具思想深度，譬如，既然汉字如人们所知是从物而不是从名的，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个由数目有限的汉字构成的基本文字表，所有其他的汉字皆由它们组合而成？非物质性的事物是否也是借助物质性的或可见的事物来表达的？汉字是不是人为地一时间创造好了的，抑或也像其他语言一样随着使用和发展而发生变化？^{[2] (P107)} 米勒在回信中对这些问题不置一词。以后莱布尼茨给米勒寄去《孟子》请他翻译而未果。怪异的米勒拒绝他人造访，并在去世前将遗物付之一炬。莱布尼茨只好通过在华传教士了解汉字和中国文化。从其获取的信息中汇编了《中国近事》于1697年出版，此书在欧洲知识界颇有影响。翌年在华传教士、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康熙皇帝的教师白晋读到此书，与莱布尼茨开始了长久的联系。1699年《中国近事》第二版收入了白晋所撰《康熙皇帝传》。莱布尼茨以其卓越智慧，洞悉中国文化的价值，对之保持着持久不衰的兴趣。在他创造“通用字符”受挫后，仍心系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一直呼吁请华人到欧洲而未果。他无法学习汉字。但从白晋等传教士的介绍中，莱布尼茨形成了自己对汉字的如下认识：

考察一下天生聋哑的人对那些不具形状的东西可能有的观念也很重要，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是用言语来描述，而那聋哑人应该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的，虽然它可能也和我们的描述等值，就像中国文字的写法也和我们的字母的写法有等值的效果。虽然它和我们的字母的差别简直大得无限，并且可能显得像是一个聋子发明出来的。^{[2] (P115)}

我们从中国文字就看到这一点。……可以有助于和隔得很远的民族容易地相沟通。

……这种文字将真正是对眼睛说话的。^{[2] (P461)}

在这里偶然性有某种作用，有时是精神方面的，在这里就有选择在起作用。也许有一些人造的语言完全是由于选择并且完全是武断的，如有人认为中国的语言，就曾经是这样。^{[2] (P296)}

语言是通过发音提供思想符号。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划提供思想符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联系。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莱布尼茨未刊稿，转引自德里达，1967）^{[3] (P115)}

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似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于是，只存在不与某种物体相似的孤零零的笔划。（致白晋信，转引自德里达，1967）^{[3] (P116)}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到莱布尼茨走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观。创造一种易学的“通用字符”，以使操不同语言的欧洲民族能顺利沟通，其文字观上的这一理想要比中国人更中国人。这理想曾经盘踞在一小撮欧洲知识人心中，莱布尼茨只是更执着罢了。上述前三段文字取自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该书致力于反驳洛克，完稿之年（1704）恰逢洛克去世，莱氏慨叹：没了对手出书何益，遂放弃出版。该书在其死后的 1765 年问世。以莱布尼茨的声誉，其关于汉字的论述，无论是见诸已经发表的著作还是他与友人的通信，都应该被欧洲文化界熟知。

卢梭便是一个证明。卢梭在其《忏悔录》中明言：莱布尼茨的著作是他最初的哲学读物之一。莱氏对语言文字的论述也反映在卢梭的作品中。但与莱布尼茨的观点相反，卢梭崇尚口语，贬低文字，认为前者属自然，后者是人为，文字与人类社会道德的堕落有不解之缘。两位对文字的看法如此不同的思想家，若对文字享有一些共识，恐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欧洲思想界的认识。卢梭 1761 年完成了《论语言的起源》之论文，1763 年加工、划分章节。死后，1781 年出版。该著作的英译者说“这是卢梭最用心的一篇著作。”卢梭在书中说：

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绘语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法来描绘对象。……文字的第二种形式是用约定俗成的字来表示词语及命题；只有在语言有了完善的发展，整个民族为共享之法律所凝聚，这种文字形式才有可能；因为这种形式包括了双重约定。汉字就是这种类型。^{[4] (P25-26)}

不管他对汉字的描述准确与否，卢梭的一个认识是明确的：人类最初的文字并不描绘语音。卢梭在语言研究中收益颇多，《论语言的起源》结尾引用其语录的同代人杜克洛（1704-1772）说得鲜明：

汉字，它对应的是思想，而不是语音。（转引自德里达，1967）^{[5] (P435)}

卢梭的巨大争议性与超凡影响力是合一的。有莱布尼茨在前，卢梭在后，我们可以深信，至 18 世纪，欧洲的文字起源观已经走出亚里士多德的阴影。

卢梭之后语言学的研究大多进入专业学者的领地，而语言学著作能在专业领地之外发生重大影响的或许首推索绪尔（1857-1913）。有趣的是，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不仅同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卢梭的《论人类语言起源》一样是死后出版，且该著作非其手稿，是后人对其三期“普通语言学”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更有过之的是，这不是索绪尔的未竟之业，他根本无意写作，他自白“厌倦了，关于语言学的问题，甚至正正经经写上十行也感到困难。”（卡勒，1976）^{[5] (P12)} 这样一部书竟成为语言学史上的所谓里程碑。索绪尔书中讨论的主要是奠基基于音位学的语言，讨论“文字”的笔墨很少。我们摘录一些：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示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词的书面形式加上它的口语形式；只有口语形式本身才是语言学的对象。但是口说的词与词的书面形式结合如此紧密，以致后者可能反客为主。人们会认为声音符号的书面形式比这个符号本身更重要。这种错误就好比认为一个人的照片比直

接看本人能了解更多的情况。

文字的影响该如何解释呢？首先，词的文字形式让我们觉得它是某种永恒的和稳定的东西。……多数人更多地注意到了视觉印象。……文学语言增加了文字本不该得到的重要性。……于是，文字就取得了本不应有的重要地位。

文字只有两套系统：表意系统，每个词由一个独立的符号代表，而该符号与词本身的声音无关。……通常被认为是“表音”的系统则努力去重现构成词的连续声音序列。……我们将只讨论表音系统，特别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源自希腊字母的系统。（索绪尔，1916）^{[6] (P29-32)}

上述文字颇耐寻味。有人认为，索绪尔在重语轻文上回归卢梭，在文字观上回归亚里士多德。还有人认为，索绪尔是全面公允的，他分明提出了表意和表音两套文字系统，且明言他在讨论后者，故其文字定义限于后者。^{[1] (P16)} 亚里士多德根本不知世界上有表意文字的存在，故现代学者回归亚里士多德的蒙昧已不可能，而回归卢梭的重语轻文是可能的。但在阅读索绪尔时，笔者最感震惊的是这位大师论述中混乱的逻辑、无法调和的矛盾。矛盾之一，也是最外在和触目的，刚言之凿凿“只有口语形式本身才是语言学的对象”，接着便说“我们将只讨论表音系统”（即拼音文字系统），后者毕竟是文字系统啊。矛盾之二，索绪尔在文字的重要性上不能自圆。他说文字不过是“照片”，接着又说“但是，字母的专横还不止于此。通过将自己强加于大众，拼写能影响并改变语言。……现在，人们实际上是按照第二种形式发音的。”^{[6] (P38)} 如果文字只是照片，没有力量，因何专横与僭越呢？索绪尔自己明言：他的口语研究离不开文字。矛盾之三，既然知晓有两种文字系统，为何只讨论其一，而不兼论二者，对此索绪尔没有给出理由。因为两者中表意系统在前，放弃了它，就是放弃了文字起源的研究。笔者明白，能指（亦有学者译成“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语言是个系统，口语立足于音位——这些卓见形塑了这座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但是在看待文字上，他岂止是回归亚里士多德，后者是不知晓表意文字

的存在，索绪尔是知道却麻木不仁，不思探究。索绪尔的文字观支配了西方语言学界几乎半个世纪之久。其后的反叛，其后“文字学”在西方的兴起，正是通过刺痛索绪尔的软肋，颠覆其理论大厦后横空出世的。

其实，在这半个世纪中，文字学的讨论，乃至其大名正号不时浮出水面，但不在西土，而在中国。陈望道 1925 年在《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中说：

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达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口耳和手眼两条思想交通的路径，现在固然有了合并的地段了，当初实非如此。

1935 年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问世。1939 年陈梦家的《中国文字学》问世。1949 年唐兰的《中国文字学》问世，他在书中为文字学寻宗明义：

口上说的语言，笔下写的文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因为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反之，中国文字是注音的，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但是，中国人把文字统一了古今的殊语，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所以，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而且一直在发展。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文字学固然不能包括语言学，同样，语言学也不能包括文字学。……真正的语言学是在十九世纪建立的，中国的语言学刚开始，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大的发展，但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杀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文字学。^{[7] (P3)}

德里达惊世骇俗的《论文字学》（1967），

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以来西方思想界厚积 51 年后的井喷。这部书中与我们当下主题相关者有以下三层意思。

其一，是对“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一脉相承的重语言、轻文字思想的批判。这些语言中心主义者，认为文字是语言的附庸；而语言所以是中心，因为它“与存在绝对贴近”。（德里达，1967）^{[1] (P15)} 用他们的框架来表达，语言是内在、现实、在场、自然，与之对应，文字是外在、印象、再现、人为。在卢梭看来，文字是“尸体”。（卢梭，1781）^{[1] (P82)} 在索绪尔看来，文字是“照片”。（索绪尔，1916）^{[1] (P29)} 德里达评述卢梭和黑格尔的文字观：“文字本身通过非语音因素所背叛的乃是生命。它同时威胁着呼吸、精神……威胁着实体性。”（德里达，1967）^{[1] (P34-35)} 索绪尔认为，音位是语言的基础，音位学使语言学成为科学，这是没问题的，是他的贡献。但是，德里达认为，索绪尔以为意义与感官的唯一自然纽带是声音，^{[1] (P48)} 是不成立的，视觉和听觉同为纽带，“气流和墨水流（都）是语言本身的组成部分”，“没有独一无二的实在”，“我们可以说汉字系统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字母系统吗？”^{[1] (P83,136)} 上述三位都声讨过文字的暴力和僭越，而德里达说：

解构这一传统并不在于颠倒它，也不在于宣告文字的无罪……之所以存在文字的原始暴力，是因为语言首先就是文字，并且这一点日益明显。“僭越”早已开始，正当性的意义出现在神话般的轮回效果中。“科学与艺术”决心生活在这种暴力之中，它们的“进步”以遗忘为代价，并且“伤风败俗”。^{[1] (P50-51)}

其二，德里达提出了文字学，并探讨其方法论。他认为，以往文字史研究的毛病是：对关键问题的简短的目的论式的说明后迅速转向对事实的说明，形成理论脆弱和文献丰富的鲜明对照。^{[1] (P39)} 他承认：

由于文字完全是历史的东西，对文字的科学兴趣便始终采取文字史的形式。……（但是）一方面，文字学必定不是一门人文学科；另一方面，它必定不是一门分支学

科。……对文字的沉思表现出来的这种元合理性和元科学性不可能隐含在一门人文学科中。……只有以所有科学为根据才能把握文字史学家的问题。对数学、政治、经济、宗教、技术、法律等学科的本质的反思与对文字史的反思和有关文字史的信息，有着深刻的联系。^{[1] (P107,123,129,132)}

其三，文字起源问题。德里达说，语言中心主义对文字的起源和地位存而不论。^{[1] (P59)} 而“文字学家几乎不能回避以提出起源问题的方式追问其对象的本质‘什么是文字’？”^{[1] (P38)} 但是在面对这个无法完全交付给经验和实证研究的起源问题上，德里达陷入了两难，一方面，显露出他不可知论者的面貌：

语言科学必须恢复言语与文字即内与外之间的自然关系——简单的和原始的关系。它必须恢复它的全部青春以及起源的纯洁性，这种起源没有历史。^{[1] (P48)}

起源问题一开始就与本质问题混淆不清。^{[1] (P107)}

对痕迹的思考无疑向我们表明不存在起源，即不存在单纯的起源；起源问题本身就包含在场形而上学。^{[1] (P106)}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的按耐不住的积极思考：

没有痕迹的可能性就没有法律。^{[1] (P139)}

文字的起源在千差万别的文化中始终是相似的，并且它以复杂而合乎规律的方式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息息相关，与家庭结构息息相通；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政治—行政机构的可能性始终要经过文牒之手。^{[1] (P138)}

独立于口语的经验多样性证实了文字发展的某种自律。文字不仅可以独立于“民族的绵延”而或迟或早、或缓慢或突然地产生。^{[1] (P435)}

正是一种突发事件使书写符号突然出现，并且使狭义上的文字的突然产生成为可能。^{[1] (P123)}

文字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难以分开。一般通过训练而成为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文字学家很少将他们的研

究与现代语言科学联系起来。^{[3] (P39)}

我们不可以奢望一位不曾研究过古代表意文字史的学者揭示文字的起源，我们重视和力图呈现的是一位西方智者的态度、方法论、对语言中心论的批判，及其批判前后西方文字观的走向。

从莱布尼茨到德里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亚里士多德—索绪尔狭隘的文字定义绝未笼罩近现代西方学者的文字观。《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该书英文版每年更新，但中译（1986）本只注根据第15版，竟未注明译自哪一年的版本）中的文字（writing）定义是：

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约定俗成的可见符号系统。这个广泛的定义包括了两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1. 早期阶段：用单个图形或若干图形的组合记事，图形本身能表明意义，无需跟语言成分对应。各种类型的文字雏形均属于这一表意符号阶段。2. 晚期阶段：不管是图形文字还是线体文字的书写符号，都成为口头语言符号（词、音节、单音）的视觉替代形式。这叫表音符号阶段，包括充分发展的文字。

而该书第15版2005年版的writing定义如下：

Writing, system of human visual communication using signs or symbols that are associated by convention with units of language—meanings or sounds—and are recorded on the surfaces of such substances as paper, stone, clay, or wood.（中译如下：书写：人类视觉的信息交换系统，使用因惯例而同语言的意义或声音成分相联系的记号或符号，并记录于纸张、石头、泥土或木头上。注：笔者不认为convention翻译成“约定俗成”是恰当的。语言中有约定俗成；文字中这种现象是稀少的，其惯例源自人为规定后的反复使用；而“俗成”是无意识的，无“人为的规定”。）

西方权威辞书中的上述定义显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和索绪尔“文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示口语”。但最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文字”定义“语言是书写符号”，

这是枉顾母语特征，顽固追随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的出版是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1986）出版两年之后，我们的词条撰写者全然无视国际学术界的进展，不思人家更新的定义与汉字更兼容。

此种顽固僵化匪夷所思，偏偏此类荒诞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文人眼中，几乎没有比“封建和集权”更易区分的概念，柳宗元的《封建论》哪个文人不知。毫无疑问，基本上秦代以后的政治体制是集权而非封建。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据欧洲历史提出的，他对自己不甚了然的东方社会审慎地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奢望以“封建”去概括。但中国的诸多学者，硬是要荒谬绝伦地给自己的社会贴上“封建”的标签。文字定义在中国的遭遇告诉我们，思想方法的扭曲固然肇始于意识形态，但它日后的走向却几乎无所不至。

二、陶符不是文字

人类文字起源探寻伊始，便有一源说与多源说之分。

一源说中，有认为人类文字起于两河流域的，也有认为起于埃及的。面对人类几大早期文字间的巨大差异，一源说提出了“激发式传播”的思想，即文字巨大的实用性和象征性，刺激接触到它的周边民族，创造出类似的具自身特征的文字（费希尔，1999）。^{[8] (P62)}

更为流行的多源说则认为极其稀少的几个地域分别独立产生了几大文字系统：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的圣刻，公元前3200年的西亚楔形文字（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实为一个起源地），公元前1200年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公元前800年中美洲的文字。

一源与多源之外的另一争议是，上述几大文字系统是人类最初的文字吗？一些学者将它们探源的目光投向了陶器上的符号：陶符。

笔者赞同多源说，所以将文字与陶符之关系的讨论聚焦于三地：中国、埃及、西亚。

在甲骨文研究获得其最初的成果后，便有学者从陶符那里寻找文字源头。此类著述甚多，大多是从细节上展示陶符与甲骨文相同、相似之

处。其核心论点有三。其一，甲骨文太成熟了，之前必有漫长的文字形成历史。其二，与甲骨文的形成晚于古埃及圣书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相对照，出土发掘的中国陶器和陶文的历史最久，数量最大。这能否证明甲骨文是从陶符演变而来姑且不论，但颇可挑战一源说之埃及中心论，因埃及可能影响两河流域文字形成的不是自己的文字而是陶符，而其出土的陶符晚于中国，后者为何不会发生其影响呢？其三，上述三种古代文字中都有与本地陶符形同或形似的，而形同形似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埃及次之，西亚再次。^[9] (P141-144)

笔者以为，回顾陶符说的提出与反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文字的起源。陈梦家（1939）说：

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字，前后不过两世纪半，在武丁时为象形字的，以后变为形声，我们可以看出不到三百年间文字变迁的速度。早期的甲骨文象形的多，可以推想它离原始文字还不很远。……我甚至于疑心文字是商民族特有的文化。……辛店期陶器上的画文，我们或以为它就是花纹，最多不过是“以画记名”的族铭。族铭只是一种征帜。……辛店期画文不能算作“有意的文字”。^[10] (P11、16)

徐中舒（1981）说：

夏代是否出现了文字或原始的汉字？据现有的出土遗存和文字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南关外，槁城台西村和江西清江吴城等地遗址……这些陶器上的符号，亦不能认为就是正式的文字，基本上还是一些记事符号。……夏代社会经济似尚无力产生一个较为庞大的卜人集团，因而当时似无将现有的刻画符号等图像进行约定俗成的条件，故无法出现殷商后期的象形文字。……没有文字而能形成一个发号施令的国家，其例甚多。^[11] (P203、204、215)

张光直（1978）说：

我的意见是绝大多数的陶文符号，包括商代和史前的在内，皆为一些家庭、家族、氏族或者他们的分支等的符号和徽号，试图把它们与我们已经认识的字进行对照并把它

们破译成有意义的句子在很大程度上不大可能。……半坡村的陶器很可能是由每个家庭自己制造。^[12] (P230)

裘锡圭说：

丁公遗址 1235 号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了一片刻有十一个符号的陶盘底部残片。……这些符号显然不是图绘，也不是无目的任意刻划的产物。……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只为极少数人所使用，并且只使用在一些较特殊的场合，成了一种行业“文字”或秘密“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符号完全有可能变得为一般人所难以辨识。^[13] (1993)

我们说汉字吸取了一些记号，并不等于承认这些记号本来就是文字。上举的原始社会晚期（注：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文化）的记号显然不可能构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同时也不像是原始文字。……某些记号为汉字所吸取，并不能证明他们本来就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只是用作族名的一些单字。……在商代后期，不少象形字已经变得很不象形，写刻文字的技巧也已经极为纯熟，看来汉字脱离原始文字阶段大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后期文字里也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原始的迹象。……从上述这些迹象看来，商代后期距离汉字基本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年代似乎也不会很远。……汉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年代，可能是夏商之际。^[14] (1978)

文字产生之前，埃及也广泛使用陶符。埃及出土陶器最多的遗址是涅迦达（公元前 4000 年上埃及的权力中心，已发现 2200 座史前坟墓）和塔尔罕（距开罗 40 公里，已发现 2000 座坟墓）。涅迦达的陶符有几百种之多，并呈现出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埃及陶符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是“王名框”，即一个方框，上面常常站着鹰神荷鲁斯，框内上面部分写着国王的名字，

下面部分用竖线代表宫殿。多数前王朝晚期的王名框刻写在葡萄酒陶罐上。王名框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从早期的图画到后来的较为抽象的无名框，再到后来的有名框。学术界普遍认为，埃及陶符是其文字取材的源泉之一，但不是埃及文字的前身。^{[1] (P74-96)} 带有王名框的陶器无疑是专门服务于王室的，因王室在文字起源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期待对王室陶器做出深入的探讨。

古代西亚陶器及陶符的出土遗址非常广泛。学者们做过这样的分析。有些遗址出土物中有陶符、无文字，有些有文字、无陶符，有三处遗址陶符和文字皆有。其一，亚赫亚一个 IVC 文化层中出土了文字泥版和一个陶符，年代难断先后，但是这些文字不是本地原生的，而是借用的原始埃兰文字，而埃兰文字的产生远远早于 IVC。其二，布拉克出土了公元前 3500 年的陶符和公元前 3200 年的文字。文字系外部传入，且文字与陶符在外型上没有相通处。其三，埃布拉出土的文字也是外部传入的，与本地陶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西亚陶符的研究者就陶符的功能提出了九种可能性：陶工符号，工厂标记，顾客标记，容量标记，容器内容标记，生产陶器家庭的标记，数字，魔力符号，死者姓名。^{[1] (P40-70, 130-132)}

对上述事实及其论辩的梳理诱导笔者产生了以下的问题和思考。

其一，为什么在迄今仅存的两种远古时代人类创造的符号——陶符和文字间，得不出一种因果的、单线的关系？原因很可能是我们所能发掘和看到的只是残缺的历史。石头、陶器、泥版、甲骨——我们所能见到的远古符号载体，都是凭借坚固的质地，穿越历史长河。很可能还有多种其他质地的符号载体已经消融在泥土和空气中，乃至事实的全貌永远不可呈现。于是非要在仅存的遗物间建立线性关系，必然是局部上似乎相像，整体上勉为其难。陶符很可能是文字前的历史中人类创造的诸种符号中的仅存硕果。比如，既然原始时代的很多陶符是王名、族徽，等等，先人为什么独一无二地选中陶器做此类标识的载体？前陶器时代就没有族徽吗？为何不曾选中陶器与青铜之外、更易加工的质料去刻写族徽？很可能前文字的时代中人类曾经创造出诸多符号的载体，它们构成了文字符号的多个源头，陶符仅

系其中一支。

其二，从考古发掘看，甲骨文自出现至成熟分明只有 200 余年。这是一个完善的文字系统真实的孕育—成长期吗？换言之，它一定需要更长的成长期吗？在何种条件下短时期亦可以成就一种文字系统？一方面笔者接受陈梦家、徐中舒的论断：文字是商代特有的文化。另一方面，笔者承认文字系统孕育—诞生颇费时日。但却以为，那可以是一个漫长期和一个短暂期之结合，前者是多种视觉符号形式（包括陶符）的呈现期，后者是文字系统的初创时。即，超过总体百分之九十九的刀背作不足百分之一的刀锋的后身，尽管最终为文明之旅开路的是刀锋。

其三，陶符是文字吗？该如何完成这一关键的判定？不做考古研究的哲学家之所以能为古文字学家提供帮助，正在于方法论之重要。德里达（1967）说：尽管语言学拒斥文字学，文字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借鉴语言学。^{[1] (P39)} 倒掉洗澡水的时候，我们不可抛弃索绪尔澡盆里的婴儿。他（索绪尔，1916）的现代语言学基石是“语言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1] (P18)} 卡勒（1976）诠释索绪尔的这一思想“只有知道了棕色和其他颜色的关系，他才会明白什么是棕色。这个道理就在于，棕色并不是由某些根本的性质所规定的的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许多表示颜色的词汇中的一个，它的意义是由和其他词汇的关系所确定的。”^{[1] (P28)} 初期的语言是否不具备系统性呢？索绪尔（1916）断然否定“假如认为早期特征不同于永恒的特征，那么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误导。我们不过是在恶性循环里面转圈。”^{[1] (P10)} 如果我们拨开了方法论上的迷雾，陶符与文字的性质便泾渭分明。陶符的功能是什么？标识。无论其作为王名、族徽，还是陶工名、作坊名、顾客名、死者名，抑或表示容量的数字，统统是孤单的标识和记号，不要也不必与任何其他事物关联，所以一器一符是大多数陶器上的陶符的特征，两符以上的陶器少之又少，遑论“系统”。

其四，陶器及陶符的制造者是陶工。张光直（1978）认为“半坡村的陶器很可能是由每个家庭自己制造。”^{[1] (P230)} 西亚陶器的研究者指出，陶符的一种可能性是陶器生产家庭的名称。^{[1] (P58)} 我

们不能排除稍大规模的陶器生产。裘锡圭说：陶符是行业“文字”，文字打了引号，说明他不认为陶符是狭义的文字。而行业文字，或曰行业符号，似乎暗指其内在的某种统一性，而一个内部沟通的陶器行业的存在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使是一个超越家庭的作坊，其对象只是需要其产品的用户，一个作坊绝无与另一陶器作坊交流的必要，且因一作坊必覆盖较大的地域，作坊间交流的成本必定不菲。再者，也是关键所在，作坊间有统一陶符之需要吗？一作坊有一统诸作坊之陶符的权力吗？就是说，零散、孤立、不成系统的作坊与陶工，决定了陶符是不统一的、不一致的。它只能在狭小的时空中被识别。或许也有超越家庭作坊的例外，埃及陶器上的王名框令人想入非非，惜今人所知的点滴信息，难以支持更大的想象和推论。

其五，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形成机制时，人们常用一个词汇概括，即“约定俗成”。“约定”对语言与文字都适用，但对文字“俗成”是存疑的。费希尔（1999）说：语言可能是进化，书写则是人类有目的的制造。^{[15]（P63）}这话有点意思，可惜粗疏了些，唯将其深入和展开方见思想者的功力。“约定俗成”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谓事物名称是依据人们的共同意愿制定的。这在语言中行得通，文字中却见不到。同一套语言可以不知不觉地覆盖广大的人群和地域，机制颇合约定俗成。文字则不同，它出现在接货人面前时送货人不“在场”，且没有“语境”和解释，只有干巴巴的一句话或几个词汇，不理解只能保持为不理解。故一套文字的形成中，“人们的共同意愿”是依靠不上的。文字这个符号系统，传播时靠的是某个“社会系统”。系统内成员已经知晓该文字，纵使天各一方，看到该文字时都能理解。已知晓此一文字系统是其沟通异地的前提，而同处一个社会系统是“知晓”的前提。表意文字系统很难约定俗成，其延展必要依赖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市场系统可以自生长，却无力帮助文字系统自生长。启动文字的最初社会系统几乎非国家权力莫属。这是我们以下两节将要讨论的内容。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何故其近亲可以自生长，即作为文字之兄长的语言，为什么可以不诉诸社会权力便能覆盖广大的人群

和地域。笔者以为，这是母语、幼态持续和人口不断迁徙三个因素辐辏而成。母亲养育其子女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教会了他们说话。人类幼子漫长的成长期，导致一个孩子有能力告别母亲和生长地，是他成长到十几岁时的事情。此时母语已经扎根在心，如若不然就必定是他追随长辈一同迁徙，母语在其长辈那里已经生根，他们还要不断使用母语。无论一个移民群体落脚到何方，不管他们在新地又开发出多少新鲜语汇，母语是他们的语言中不可动摇的底子。同根的人群相遇时，各自带着七八成的母语，二三成的新词，便既可畅通地交流，又能相互增添彼此的语汇。或许这就是语言的自然进化。这机制管不了文字。

三、泥筹与泥版

1929 年德国学者在乌鲁克（现伊拉克南部）发掘到大量楔形文字泥版。年代约为公元前 3200 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楔文。其形状与大家预期殊异，即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似象形文字。凡此种种，诱发着学者们探讨楔文的起源。如前所述，陶符系原始楔文的假说难以成立，此消彼伏中，另一解释渐渐成形。

1921 年法国学者雷格兰（L. Legrain）认识到苏萨的某一出土物是封球。1959 年欧本海姆研究了努吉出土的球封上面的楔文，文中多次出现一个近似于“卵石”的词汇。可惜上述两封球内的物品早已遗失。1966 年法国学者阿密见到了全套装置：封球及其内存物，识别出后者即欧本海姆所说的卵石，阿密称之为 calculi（筹码）。其后的学者更认识到封印。此一探索的集大成者是史蔓特－白瑟拉特（D. Schmandt－Besserat）。她自 1969 年始遍访 14 个国家的 30 个博物馆中的相关文物，1992 年完成其著作《文字之前》。^{[16]（P150－151）}

我们将史氏的理论称之为“泥筹”。国内学者拱玉书系统地介绍了这一理论，但他称封球中的筹码为“陶筹”，笔者认为不妥。史氏称此物为“小型泥制物”，她统计分析的此物中 14% 是石头和沥青制作物，其余皆为泥制物。故笔者认为，应该将 clay token 译为“泥筹”。首先，泥制品经晒干、风干或烘干，与陶坯入窑烧制的工序截然不同，称其为“陶筹”易与陶器混淆，

误读读者。其次，此物的原料和制作与楔文“泥版”相同，故称其为“泥筹”合情入理，名正言顺。

大约自公元前 8000 年始，西亚人，特别是苏美尔人，开始使用泥筹记录物品，此一传统渐渐光大。以后有了货物的运送，为防止丢失，送货人想出了一种让接收人验货的方式。大约公元前 4000 年时，bulle 出现了。国内学者也有译为信封的。苏萨出土的 bulle 或为圆形，或为椭圆形，译为封球较好。送货人将与货物一一对应的泥筹放入球内，并在泥球未干时印封，最初是平印，后来是滚印。此时的泥筹已有长足的演变，原初的泥筹无孔、无刻记，此时或有孔，或上面刻有种种线条，后者的含义尚待揭晓。如此，接货人破球后对比泥筹和货物，如同今人照单收货。很可能是送货人在印封后常常忘记内中泥筹的数目，为自己方便，在印封时将带有刻写线条的泥筹一一按在未干的封球之外。初衷为弥补自己遗忘的这一方法，也给收货人带来了便利，他们不再破球看取泥筹，只看球外的印记便可验货。不期这一讨巧的举措完成的竟是一项极大的变革，人们开始以印纹代替泥筹，以二维代替三维，以符号代替实物，即泥筹。当然其实泥筹也是实物的符号，如此说来，印纹就是“二级符号”、“符号的符号”。既然印纹可替代泥筹，球内不必盛装泥筹了，不装泥筹还费心制球作甚。当印纹代替泥筹后，印纹的载体封球转化为泥版便势在必行。这就是“泥筹论”对楔文起源的解释。^{[6] (P15-18)}，^{[7] (P149-157)}

该理论受到的最大质疑是“大约 1500 多个苏美尔符号，该理论的解释只涉及到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 tokens（泥筹）符号造就了苏美尔系统，那么它们就应该影响了大多数符号。”^{[8] (P18)} 辩护者则说，楔文的来源除了泥筹还有陶符、滚印。^{[9] (P68-69, 289-292)} 笔者在上节曾说，陶符很可能是同期产生的多种人造符号中硕果仅存的遗物。笔者以为，泥筹说的贡献在于探索楔文初创时的动力机制，而不在于指认楔文的前身，或指出该地区此前哪一种符号对楔文的造型构成发生了最大的影响。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笔者不知史氏是否论述过，亦不知遭遇挑战与否。泥筹最初是模拟和象

征实物的，要收货人明白不难。在其转化成泥版楔文的过程中，收货人凭什么能跟上送货人在符号制作上的变化和扩展。当面交换，则一切都好办。而一个渐变的文字系统传到四方商人手里，他们凭什么就能解读呢？

费希尔介绍“泥筹理论”的第一句话是“完整书写的出现无疑是出于记录日常生活的需要”。^{[6] (P15)} “日常需要”存在于远古时代一切人类群体中，为什么只有极为稀少的地区中产生了文字。商业需求与日常需求同理，呼唤不出文字。雅各布森说：在导致文字产生的诸多社会力量中，经济需要占据突出位置。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是响应经济需要而出现的，并被苏美尔人发展为一个高度成熟的管理机构的工具。这个机构控制着物品、服务及社会特权的分配。^{[6] (P384)} 埃及圣刻和中国甲骨文，都是因宗教而非经济原因而产生的，这似乎质疑着“经济需要占据突出位置”。但是如同笔者并不认为宗教是文字起源的最重要原因，笔者也不认为经济是其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埃及、中国的宗教追求和苏美尔人的经济追求后面的那个力量，即国家权力。三大国家权力分别在各自的宗教与经济追求中促进了文字的产生。雅各布森记述的前后关系有误。不是先有了经济需求，其后产生了楔形文字，再后变为管理机构的工具，相反，管理机构是文字产生的第一推手。

对上述论断的微妙之处，还需补充说明。唯国家权力可望产生文字，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权力都一定会创造文字。换言之，文字依赖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依赖文字——这两个命题是不对等的，前一关系是非它不可，后一关系是有它方便。徐中舒说“没有文字而能形成一个发号施令的国家社会，其例甚多。”^{[11] (P215)}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当然不是唯一例证，惟其统治地域之广阔，堪称无文字国家权力的典型。

1204 年乃蛮王国失败时，成吉思汗收留了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为他服务。塔塔统阿负有责任要教会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用回纥字体写蒙古文，同时，使他们用皇帝印玺以签署公文，这就是一个国务衙门的雏形了。^{[17] (P246-247)}

之前无文字，之后也不会短期形成文牒管理系统，故引入乃蛮王国的回纥人，与其说证明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文字管理，毋宁说揭示出其无文字管理的本色。印加帝国是无文字国家权力的又一例证。我们通常说“史前”其实就是“文字前的历史”。因为在器物的考古和基因的生物学鉴定出现之前，古代文献几乎是唯一了解当时历史的手段。复杂社会的无文字管理一定是凭借精炼的口语转达、卓越的记忆力、以及帮助记忆的非文字手段。了解其具体入微的管理术既是超难的，也是价值非凡的。但不管他们凭借什么，恐怕都颠覆不了无文字国家权力曾经存在过的事实。

我们回到苏美尔文字与经济生活之关系的讨论上面。泥筹与封球是用于经济生活的，故何种经济生活成为问题的关键。

上述法国学者阿密认为：苏美尔的生产者将他们的产品和清单，即封球和其中的泥筹，一起交给中介人，后者将之送至国家管理中心。^{[1](P300)}沙尔瓦特认为，在乌鲁克中期，出现了物资“再分配”。^{[2](P299)}笔者理解，再分配通常是由国家权力实施的。按照二位所述，泥筹不是在一般经济生活中，而是在国家权力管理下的经济网络中，演变为楔文泥版的。

苏美尔国家权力的形成先于文字，是不乏旁证的。其一是早期楔文中的内容。乌鲁克的 5000 多块早期泥版中有 650 块属于词表。共 15 种词表中包括人表和官职表。两表中呈现出多种官职。另一佐证是在公元前 3500—3200 年前已经出现的大型建筑：神庙和宫殿。^{[3](P293、290)}

如果承认劳动分工、社会等级的形成以及如此复杂的官吏等级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的话，就不能不承认，它们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即在乌鲁克 IVa 之前，就已经存在。^{[4](P293)}

苏美尔国家权力存在于前，使得楔形文字产生的解释顺理成章。国家权力拥有自己庞大的管理系统。一方面，国家权力在此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造符号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文字；另一方面，培养出识别这套文字的文牒官员，遍布其管理系统中。只有文字系统与识别

文字的人员系统的匹配，才能使文字成为有效的媒介，运行于商业之中。

远古的历史必是极度残缺的。依赖不同民族的远古历史事实的互补和对照，我们对人类早期文明才有了较多的理解。我们至今对楔形文字的创作者们一无所知。所幸从人类早期的另一支自源文字系统中，我们依稀看到文字创作者们的模糊身影。这就是商代的甲骨文与贞人群体。

四、贞人与甲骨文

1890 年前后，河南小屯村的农田中常有殷代甲骨出现。村中的理发匠李成将之碾成粉末医治刀伤，后又卖给当地药店，如此经营竟十年左右。有心的古董商看到了甲骨上的契刻，便携带至北京见示于王懿荣、王襄、孟定生等人。深通金石学的王懿荣“见之狂喜”，断定其为上古文字。此为 1899 年（光绪 25 年）的事情。^{[5](P647-648)}此消息不胫而走，并带动了小屯村民的发掘和售卖。自 1899—1928 年当地村民有过九次私掘，所得甲骨近十万片。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成立，就在同年殷墟发掘开始了。自 1928—1937 年共发掘 15 次，获得甲骨 24918 片。1949 年后发掘获得 5669 片。

须补充说明几点。其一，以上所说仅为有字甲骨。发掘出的还有无字甲骨。李济总结殷墟前六次（1928—1932 年）考古发掘时会说“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6]刘一曼说，即便在卜辞甲骨出土最多的小屯，“无字甲骨之数则难以统计，估计比有字甲骨之数量更大”。^[7]她统计了 1950—1991 年 22 个地点的出土甲骨，无字卜骨 5975 片，有字卜骨 5604 片，无字卜甲 1690 片，有字卜甲 662 片。其二，“片”，“只是‘数’而已，‘量’却不可捉摸”。^{[8](P15)}原因是大小片差距悬殊。完整的龟甲长达 20—30 公分，刻文多者近百字，破碎的小片只有指甲大小，上面仅有一两字。“从‘数’上看，后期没有前期的多；从‘量’上看，前期没有后期的多。”^{[9](P17)}其三，早期的私掘和私售推动了作伪刻字者，且因多刻在殷代的无字甲骨上，易于乱真，为研究设置了障碍。

埋藏地下三千多年的甲骨，在二三十年间出世十万余片，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董作宾在甲骨文问

世 50 年时说“五十年之内，这种学问，竟逐渐蔚为当世的显学，全世界的学者竞相研讨。”^{[21] (P11)} 到今日甲骨学已成透视人类文字起源最重要的学科。而围绕甲骨文一百一十年的研究，无论在纵深还是宽广上，都有长足的进展。

甲骨文为殷代占卜文字，即殷代王室施灼龟甲或牛肩胛骨，通过裂出的“卜”字纹解释所问事情的凶吉。以后的学者发现，施灼占卜之术起源甚早，几乎是世界性的。^{[22] (P86,89)} 中国最早的施灼占卜遗物为内蒙古巴林左旗高河沟门的牛肩胛骨，年代为公元前 3318 ± 181 年，距今 5300 年左右。最初鹿、熊、羊、猪、牛骨均被使用，以后牛肩胛骨更为普遍，再后才使用龟甲。艾兰（1991）说：

为什么选择用水牛（或黄牛）的肩胛骨来占卜的原因很容易推测，它们的平面在普通兽骨里是最宽的，容易在兆旁边刻写卜辞。^{[23] (P132)}

问题在于牛肩胛骨用于占卜早于卜辞的发生。考古学家基本共识早于殷墟的白家庄、二里头遗址中均有牛肩胛卜骨。故牛肩胛骨最初是因骨面平阔而被选择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可以认为，当刻写卜辞的需求产生时，此前已使用的诸种兽骨中牛肩胛骨成为首选。但是也可以认为，施灼占卜后平阔的牛肩胛骨诱发占卜者萌生了最初的契刻的欲望。龟甲用于占卜也出现于殷墟之前的二里头遗址。^{[22] (P87)} 占卜活动已经使用过多种兽骨，卜辞却还未产生，若再添新的兽骨显然与卜辞无涉，那么为什么又要加上龟甲呢？可以认为，是龟的长寿及其形状特异带来的神秘感，使得人们感觉龟甲占卜最为灵验故青睐于它。极可能是占卜时牛肩胛骨与龟甲的平阔诱发了占卜者在占卜之后契刻几个符号于其上的愿望。卜辞的产生才进一步锁定了龟甲与牛肩胛骨，特别是前者在占卜中的地位。

王室接过前国家时代已经流行的占卜习惯很好理解，因为其时大家共享一种思维方式。而王室着手占卜必大大增加占卜的频次，因为王室的活动，乃至带有风险的出行更多。

每旬必卜“旬无祸”，这是一种例行的公事。自盘庚迁殷以至帝辛亡国，八世十二

王二百七十三年间，每月三旬，每旬必卜，且不止一次。^{[21] (P129)}

除此之外，王室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大贵族在占卜方式和风格上也与小贵族和平民拉开距离。我们可从五个方面透视。其一，非王室和大贵族更多地使用牛肩胛骨，而王室更多地使用龟甲。当然这是源于骨比甲易得，甲比骨稀罕。其二，王室使用的龟甲的尺寸大于非王室。王室和大贵族所在地出土了很多长度在 30 公分以上的龟甲，非王室和大贵族出土地未见 28 公分以上的龟甲。原因在于，小贵族们只能使用本地龟甲，而北方不生长大龟，殷王卜用的龟甲多为来自南方的贡品，特大的龟更是产于马来半岛。其三，施灼占卜前对甲骨的整治。王室甲骨的整治极其精细。以龟甲为例，先将首尾锯掉，边缘修成弧线，然后先凿后钻，将高骨去除，在龟甲上钻出一排排整齐、深而圆的洞，但不可钻透，“留有薄层，备作正面显示兆枝之垢处。”^{[24] (P113)}，^[25] 非王室要么整治粗疏，要么完全不整治。其四，有卜辞的甲骨基本上属于殷王及与之关系密切、地位极高的大贵族，小贵族和平民的占卜甲骨基本无卜辞。其五，占卜后对甲骨的处置方式。王室与大贵族同小贵族与平民截然不同。

一般遗址的卜者，占卜之后，很快将甲骨如同垃圾一样遗弃；而小屯、花园庄东地的卜者，虽有随意舍弃卜后甲骨的现象，但经常是将卜后之甲骨保存一段时间，再集中埋于窖穴之中。^[26]

王室甲骨的散佚、废弃都是少数。^{[21] (P58-61)}

以上种种差异的存在，从政治学、社会学的一般意义上看待，颇易理解。举凡上等阶级，王室更不待言，一定会利用种种手段，垄断稀缺资源、知识、工艺，以赫然区别于其他阶层。但若微观具体看待，则以上五种差异又有不同。前两种差异，即更多地使用龟甲乃至垄断大尺寸的龟甲，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上述用心。后三项差异在昭示区别性上，甚至比之前两项更有过之；但却留有很大的疑问，即此三种行为是为了什么。独占和垄断是无疑的。但那不可能是虚妄的追求，其中必有某种实用价值的存在。实用性与炫耀互为表里，后者不可能脱离前者而存在，百无一用

如何炫耀呢。这三项活动——占卜前甲骨的整治，卜辞即文字的契刻，占卜后甲骨的处置——中，我们最关心也最费解的是发明文字的用心，而思考前后两项活动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中间那项活动，即契刻文字的意义。

占卜前的凿钻很专业，非“经过专门训练、技术娴熟的卜者”不能为之。^[20]那么整治是为了什么呢？逻辑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其一，为了施灼占卜时省力、见效、事半功倍。一些古老技艺的作用，常常是在无法完成该项工作时才被我们意识到。请看当代日本皇室占卜的故事：

在日本，历代天皇举行登基大典时都要有卜部的官员龟卜。据说占卜的方法都是父子口口相传。大正天皇登基时会命令卜部的每一家都举行龟卜仪式。据卜部的人说，纪州的一家渔夫好不容易搞到了一枚玳瑁的龟甲，就在家里的灼烧，尽管是浓烟滚滚，但龟卜的效果却并不理想。看来在长达 45 年的明治年间，通过口口相传下来的秘诀或许把最重要的部分丢失了。^{[25] (P19)}

笔者怀疑，未经专业人士整治，是那副龟甲灼烧不出卜兆的主要原因。其二，如此煞费苦心去整治，意图应不限于施灼后出现卜兆。艾兰（1991）的判断是：

（占卜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控制宇宙的手段。……商人在甲骨上制造人为的兆头去跟叙述性的建议相应。……贞人希望在占卜里包含整个宇宙，不要有任何凶兆。……它们的根本企图不是对将来做预言，而是企图确定神灵很满意收到的祭品，不会降灾，对什么将会发生的陈述是想得到一个响应，如果祭品不错，那将来就是“亡祸”（即“无祸”，卜辞中最常见的词汇——笔者注）……第一期卜辞中，不吉的占辞并不少见；但到了第五期，只是按照惯例写“吉”……这大概是因为甲骨上不再有凶兆出现，占卜只是单纯地用来证实向神灵们奉献了祭品。^{[23] (P210、150、149)}

饶宗颐描述这一争论并陈述他自己的见解：

夏含夷说 “占卜已经不再仅仅是知道

未来的一种手段，而是控制未来的一种尝试。”……可见古时王者占卜并不是全部听龟来取决，而是“朕志先定”再行命龟的，换一句话说，人谋是在先的。……倪德卫教授说 “《金縢》所记的占卜，是为了祈求鬼神同意占卜者的请求，不是为了决疑而进行的。”我想古代重要的事情一定是“先蔽志”然后再去命龟，所以人事的决断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完全说不是为了决疑。——《左传》已说过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可以见之。^{[26] (P843-844)}

笔者以为，不可以静态地、不变地看待占卜的目的。但占卜到了君王手中，并开始成为频繁的常规化的事务，当事者的心态和手法都会渐渐演变。艾兰提出从第一期卜辞到第五期卜辞中凶兆的锐减是耐人寻味的。笔者以为，极可能是凿钻在其中发生了作用。笔者绝不认为古人的心态和做法会像今日的作伪者一般，而是认为，他们很可能以为凿钻龟甲是在探索、掌控而非篡改命数。模拟凿钻和分析不同凿钻形态的烧灼效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上述猜想和争论。

殷代王室存储甲骨是精心之作，以下描述可资证明。

存，是有意的保存着，储，是有意的储藏起来。每一个王，常常有巡守、征伐、田猎、游观等等活动，这些活动都有贞卜、又都不在殷都。又凡是卜夕的文字，多属于王在外面的时候。因此卜夕之文，常记有“在某地卜”的字样，田猎征伐游观，也记所在之地，这些甲骨，必是用车载去而又载来的，不然就不会出现在殷代的都城（小屯村）。很明白的例子，像帝辛征人方，从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七月，向东南部兜了一个大圈子，南到淮，东到海滨又到齐。迁京之后，所卜用的甲骨，都完全带回来了。^{[21] (P59)}

1936 年 3 月 18 日至 6 月 24 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村的第 13 次殷墟发掘：

得完好无缺的储藏甲骨文字窖藏一所，坑为圆形，径约二公尺，深一公尺余（1.6 公尺），满贮龟甲。此一坑中有完整的龟腹甲二百余版，编号共为 17804 片。……紧靠

北壁，有一个拳曲而又倒置的人体骨骼，大部分陷入甲骨堆中，可知是同时埋入的。这一个发现，证明了甲骨文字一部分是有意的埋藏。石君（石璋如，这次发掘的主持者——笔者注）以为此坑即不是墓葬，此人可能是保管甲骨者，因甲骨的被埋藏，随之殉职，乃一跃而入。^{[21] (P51,58)}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占卜不作文字记录，存储占卜过的龟甲还有什么用；那几乎是一堆毫无差别的龟甲。占卜是为了在某一行动可否实施上获得启示，既已得到神灵或是或否的答复，占卜所承担的任务便告终结，那片不辱使命的龟甲可以废弃了。在通常的、“真实”的占卜意义上，存储是匪夷所思的。只有在做出上述的“甲骨整治”的分析后，我们才能想象存储的如下意义。其一，每片卜辞记述了王要做什么。其二，每片卜辞差不多都以明白无误的卜兆，显示神灵允准商王实施此举。其三，一片两片不足为证，唯大量存储的甲骨文字才是神灵保佑商王的系列证明。内中不乏少许凶兆卜辞，更凸显其整体真实性。其实王的每日生活与百姓一样是庸常的，除稀少的大事件外，最初谁也不会觉得有记载的意义。但当它们披上了“龟甲—祖先—神灵”的外衣，并串联起来，就成了伟大的史诗，区别性、合法性、神圣性，尽在其中。以文字记载的动力或许就是如此沛然而生的。接下来的疑问便是甲骨文的最初创造者们。

“癸巳卜贞旬亡祸十一月”——这段卜辞选自“大龟四版”之四上面。从中可以看出卜辞的通常格式，即先记卜日的“干支”，次记“卜”，再次记“贞”，其后是或长或短的问卜语，很多卜辞中卜贞两字之间夹着另外一个字。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后的30年间，“贞”为何意始终存疑，刘铁云释“贞”作“问”，如此却无法解释“贞”前面的那个字，其他人也始终提不出更好的说法。“贞”字前不断更换的那些字，更令研究者们失语。这疑团成了释读甲骨文的一大障碍。1929年12月12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次发掘中于“大连坑”中出土了完整的“大龟四版”。其中一块是卜旬版，上有历时9个月的22条卜辞，其中卜字后贞字前共出现6个不同的字。董作宾先后排除了它们是地名

（因前面没有“在”字）和官名（做同一工作不会有6种官职）的解释，最后推断它们是人名，而“贞”就是“贞人”，比如，“宾贞”就是名叫宾的贞人，“尹贞”就是名叫尹的贞人。董作宾认为，要明确什么是“贞人”，就要区分卜、贞、王：

卜与贞，本是两件事，早期是太卜司卜，太史司贞，有时王来亲贞。……卜人应该是只限于太卜，才有这灼龟见兆，断定吉凶的专长。卜辞里也偶尔见卜人的名字。……“贞人”是问卜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史官，但不全是史官，有时候殷王亲自来问卜，记着“王贞”，这王也可称为“贞人”，王妇、王子、诸侯，偶然问卜，都写他们的名字，也都可称为“贞人”。不过史官作贞人，所记卜辞都是自己写自己刻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手笔真迹，比较他们书契的艺术和技巧。若是王贞，则卜辞的书契，自然需要史臣代庖。帝乙帝辛父子欢喜自卜自贞，常见“王卜贞”的记录，而记录者却是太史，并不是王亲自书契。^{[21] (P96-97)}

换言之，问卜的工作大部分由史官来做，史官是替王来问询神灵，所以贞上的人名即代王问事情之人，称为“贞人”。^{[21] (P143)}

董作宾“贞人”的推断是甲骨文研究的里程碑，意义有二。其一，划定了书契甲骨文的小群体，这对于文字起源的研究意义非凡。其二，“贞人”是帮助庞大芜杂的十万余片甲骨文确定各自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董氏个人研究旨趣而言，“贞人说”的提出是为甲骨文断代。

在笔者这样的甲骨文外行看来，自董作宾之后最出色的甲骨文著作当推陈梦家的《殷虚甲骨综述》，不是因为其易懂，而在于其超越文字之考据，打通微观与宏观。陈氏从下述几个方面挑战与发展了董作宾的观点。

其一，陈梦家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王国维、董作宾提出盘庚以后武丁以前的卜辞，是不成立、不确定的，故陈氏认为殷代卜辞始于武丁。^{[18] (P33,75,139)}此后，历经40年的发掘和研究，李学勤、彭裕商维持着这一判断：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字,凡是能确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时期为最早。迄今为止,还未找出确切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27] (P328)}

这一判定关键且要害。因为盘庚在其统治十四年之际,将国都从奄(现山东曲阜)迁至殷(现河南小屯)。若殷墟发现了盘庚的卜辞,则可以理所当然地推理:卜辞的传统有源自商王盘庚、南庚和商都奄的可能,乃至更早的商王和商都。反之,如果小屯村的发掘与鉴别呈现出清晰的、从无到有的世代断面,则几乎澄清了甲骨卜辞的起始年代。而小屯村有限的空间和不断的发掘,几乎坐实卜辞起于武丁之说。《书经·无逸》记载,武丁“享国五十有九年”。武丁不断对周边部落和方国用兵,据《易经》记载,其中一次与西北边的鬼方作战,历时三年获胜。《孟子·公孙丑上》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武丁时期的卜辞上记载的方、方伯、侯、子、男等诸侯,证实了上述记载。殷墟所见最大的一块卜辞龟腹甲系武丁时期的,说明八方来朝上贡与龟卜地位日隆。而“享国五十有九年”无疑为卜辞这样庞杂且无先例的事务得以开创,并成其气候遂被继承,提供了时间的保证。

其二,对贞人的辨析。陈梦家在其著“百官”一章中描述了卜辞中出现的二十多个官名,其中包括“卜”,却不含“贞”。他说“賓、母、即,都是卜人名,各于其名前冠以官名‘卜’。”(陈梦家,1956)^{[18] (P519)}照此逻辑,“癸巳卜賓贞旬亡”可译为:癸巳,卜人賓某询问:这十天有无灾祸;殊异于董作宾的译法:癸巳做卜,叫作宾的贞人:这十天有无灾祸。陈氏接受、且高度评价董作宾对“賓”等都是人名的判定,却认为,“卜事”是分工的,命龟(即占卜时询问神灵)只是其中一项,卜事由卜人做,命龟之人(董氏所谓贞人)属于卜人群体。但是当我们虑及殷王有时也亲自命龟,几乎可以断定不是所有卜人都堪此任,故可以认为命龟是卜人中的资质最高者。且笔者以为,即便当时卜辞中的“贞”不是官职名称,在今人研究中为区别命龟者与其他卜人,将前者称为“贞人”是有益而无妨的。但陈氏还有一个判断不容轻视:

董氏从看到有七版完甲上廩辛卜人狄许

多的刻辞往往有“书法的歧异”,即连他自己的署名在一版之内可有不同的写法,他将此解释为狄书写太随便与太不规则。我们以为这种现象正足以证明卜者与刻辞者之不属于一人。我们看到许多同版的卜辞,同属于一个卜人的卜辞,其字形的结构与风格不同处,正证明了卜人并不一定是刻者。(陈梦家,1956)^{[18] (P16)}

他这里说的卜人相当于董氏所称的贞人,即贞人未必是刻者。他在另一处说:

董氏以贞人断代本是很重要的发明。但是他以为“贞人”不但是命龟者的卜人,又是史官;不但是刻卜辞的人,并且是书写卜辞的人。这样的引申,就过分了。^{[18] (P15)}

以上说法言之成理,却令我们丧气地看到:确定原初书契者群体之艰难。按董作宾说,贞人司职书契,研究文字的发明者只需关注贞人好了。按陈梦家说,贞人是命龟者,他们“不一定是刻者”。笔者猜想,贞人中可能有些亲力书契,有些则交付其他人去做,原因或许是书契技艺的问题,即不是人人都擅于书刻,但贞人似乎都应该是识字的,不然甲骨文精心储存为了什么呢?它们应该是为了殷王与命龟层次的宗教人士阅读的。即笔者以为,“卜人不一定是刻者”不是缩小了文字发明者的圈子,文字发明者在卜人群体中,必定包括贞人,但不限于贞人。

其三,陈梦家承认,其时甲骨文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是考定年代与分别时期。而断代的重要依据是世系、称谓、占人三者间的互证,三者中又以贞人,陈氏固执地称其为卜人,尤为重要。陈氏觉得董氏的“贞人王朝”的划分太粗,他企图将分期细化,最终变“贞人集团”为“贞人组”。陈氏对此有三点贡献。董作宾先后两次从卜辞中搜寻贞人,首次得 26 人,其后增至 77 人。一,陈氏从甲骨卜辞中搜录到 120 名贞人。二,重新核定了贞人们所处的王朝,对董作宾的一些考定做出修正。其中最大的差别是董氏第四期的 17 个贞人,陈氏认为当属武丁时期。三,陈梦家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甲骨文界超前的观点:

按照我们的看法,字体文例如一切制度是逐渐向前演化的,不能机械的武断的用朝

代来分割。^{[8] (P155)}

他只是有限地实施此一原则，即对那些无贞人名字、且与有贞人名字的卜辞不处在同版上的卜辞，根据字体文例判断后放入贞人的“附属组、不附属组”。并对每一“贞人组”内的成员做出时间先后的一点区分。

以下为笔者根据董、陈二人著作编制的贞人断代表。^{[21] (P109-114), [8] (P203-205)}

董作宾贞人断代表		陈梦家卜人断代表	
王朝	贞人数	卜人数	王朝
武丁,可能还要加上盘庚、小辛、小乙,以至祖庚	25	42	武丁
		31	武丁晚期
祖庚一部分,祖甲	18	6	祖庚
		16	祖甲
廪辛,康丁	13	18	廪辛
武乙,文武丁	17	1	武乙
帝乙,帝辛	4	6	帝乙,帝辛
共计	77	120	共计

不管是否得自陈梦家学术思想的遗产，今天的甲骨文研究者，注重字体与卜人的不同属性。李学勤与彭裕商说：

卜人分类的尺度较宽，而字体分类的尺度较窄，也就是说由卜人联系起来的卜辞比由字体联系起来的卜辞要多些。……“同一卜人所卜之辞，在字体上可能分属于不同类别”，实际上这是极少数的例外现象，例外现象在各种事物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我们在这一定为分类标准的卜人，事实是指卜人集团。事实已经证明，各卜人集团的卜辞在字体上都互不相混，不能因为有极少数例外现象就全盘否定事物的本质。^{[27] (P19)}

由上可见，今天的研究者们断代的方法虽已更重视字体，并未颠覆，而是甄别、发展了陈梦家上述卜辞断代。就笔者更关注的武丁时代，即甲骨文初创时期贞人的规模，今天研究者们确定的数量大约一百有余。^{[27] (附表), [8] (P204)}

贞人来自何处，本文关注的问题幸运地被甲骨研究者们之后的一个洞见照亮。

饶宗颐在其 1959 年出版的大作中说“贞人人物之名号，其中不少原为地名，此等称谓，有时不是某一个人之私名，可以指若干人。例如春秋之齐侯晋侯，可指若干世之齐君晋君，不能专属小白与重耳。”^{[26] (P1200)}不久，张秉权撰文说：“甲骨文中的人名似乎不是他的私名而是他的采邑或方国之名，所以隔代之人可以同名。”（转引自饶宗颐，1987）^[29]日本学者伊藤道治（1975）继续这一探索：

据同为第一期卜辞的三五·一零十京津一六八一……吉在第一期某个时候受到殷的征伐，然后附属于殷，其一族的一部分人在殷都为王服务，他们的本住地成为王的田猎地。……人文 B 零九六二号卜辞里出现的吉也是第三期贞人……第三期里，吉族出身的贞人在殷任职。^{[30] (P51,50)}

兄祖庚在位时，在野的祖甲把那时统帅的几个集团的习惯反映在他即位后的制度里；关于贞人的选用，也很有可能从祖甲在野时跟他亲近的族群中去选用。……另一方面再看“大”，“大”虽是武丁时代被征服的族，但它跟殷的联系在武丁时代的旧派时更亲近，在第二期祖庚时代作为贞人出现。

殷强大之后，（在）归其支配的小国，贞人仍位于其国家的中枢。这个贞人具有判定小国内的人们行动善恶的能力，就是说可称之为咒术师，殷从被征服的国家，把这些贞人叫到殷都，由此而使殷王室有关占卜方面也具备了优越于其它国家的能力。进而可能是想在精神上也支配当时的世界。在第一期标准卜辞即王朝卜辞里，占卜的判定者只限于王，而且王也以贞人的身份出现。这表明王在贞人集团中是具有最卓越的能力的贞人。^{[30] (P55)}

饶宗颐在提出贞人名号疑为地名之后 28 年（1987），推进了自己的判断：

主持贞问之人物既多为邦国小君，可能即夏、殷以来之巨室。^[29]

上述三位学者共认，贞人来自殷的邦国、方

国,其中一些贞人为“邦国小君”。殷代王朝垄断了这些贞人,便将龟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经由这些来自四方八国的贞人之手,卜辞即文字诞生了。笔者在前文说过:文字的孕育很可能是“一个漫长期和一个短暂期之结合,前者是多种视觉符号形式(包括陶符)的呈现期,后者是文字系统的初创时。”来自诸国的贞人将各地形形色色、传之不远的视觉符号带到了殷都,为汇聚百家、熔于一炉的文字创世纪,做好了准备。也可能卜辞的萌芽间或地出现于某方国,这信息一旦进入殷王武丁之耳目,几乎必定被攫取和光大,因为他矢志且开始执龟卜之牛耳,他要占有硕大无朋的龟甲,囊括众多睿智的贞人。若邻邦有了卜辞,他焉能无动于衷。

综上所述,甲骨卜辞,是在殷王武丁治下的五十余年间,经一二百贞人之手初具雏形,并在其后八位殷王,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中走向完备。与神灵通话之记录,既满足了殷王的宗教追求,又捞取了敌手无法复制的政治合法性,此说对卜辞初创之动因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其他视觉符号也须进入视野,何况正是卜辞中出现了“乍册”二字。乍册是周代因袭商代的史官名,它与周成王诰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相印证,“则殷代已有竹木简的册书,大约是不成问题的。”^{[18] (P518)}

陈梦家曾说“我甚至疑心文字是商民族特有的文化。”^{[10] (P11)}以后又说“在它(武丁)以前,应该至少还有500年左右发展的历史。”^{[18] (P644)}而武丁前的商代只有280年左右的历史。何故又增添了200年呢?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与其梦想能出土更久远的文字载体,不如致力于武丁时期卜辞的精细断代,确定卜辞问世的那一瞬间,其词汇量、其稚嫩程度、其后几十年间的发展轨迹,以判断它是最初的文字,还是更有前身。至于殷代的竹简、木简是在卜辞之前,同期,还是之后,笔者持开放态度。但更愿意相信,最初的竹木简同是占卜的伴随物,即它是甲骨卜辞的姊妹篇,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与文字的其他用场相配套的某个系统的蛛丝马迹。

五、象形文字与声借

我们说过了两河流域的楔文和中国殷代的甲

骨文,下面要谈古代埃及最早的文字圣书文。埃及文字是否独创一直存有争议。一派学者认为,埃及文字是独创的,甚至是最早的文字。^{[8] (P62)}更多的学者认为,楔文的形成稍早于圣书文,且埃及文字的形成期正是它与美索不达米亚联系频繁的时期,滚印便是它吸收后者文化的证据。虽然圣书文与楔文在字形上完全不同,而这派观点认为埃及人受到了文字理念的影响,即所谓“激发式传播”。^{[31] (P119)}如笔者上文所述,楔文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泥筹在政府经济活动中的使用和变异,甲骨文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殷代君王与其贞人集团从事的占卜活动。迄今为止,鲜有学者指出埃及圣书文最初的、具体而单一的用途。相反“最初圣书字使用于多种场合和多种目的,并不限于庄重和神圣的场合,而且既可以手写也可以雕刻”。后来手写体(僧书体)变得更草率,圣书体才专事神圣庄重的事物。^{[32] (P3)}自源的创造大多起于某一具体事物,借鉴他人技艺更可能起始就应用于多个方面。这一枝节或许可以给埃及文字非自源说微弱的支持。但诚如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对其论点的自我评价“在假说上再架上假说”,^{[30] (P232)}此情形岂独伊藤君的甲骨文研究,古文字研究大多难免假说。在事实的真实无法齐备时,逻辑的真实成为争论的热点。

圣书文与甲骨文的破解几乎是前后脚的事情。圣书文的破解本有一定传奇性,后又被进一步的故事化所夸张。

1798年拿破仑三万八千官兵远征埃及,稀罕的是法国国家研究院150名学者随军同往。8月19日一士兵在罗塞塔镇的一面残墙下面发现了高近一米二的一块灰红色石碑,一面有铭文,由军官转呈学者。学者发现上面铭刻着三种文字:象形文字(圣书字)、希腊文、古埃及的“世俗”文体,大喜过望,判断三种文字必是书写同一内容,便以为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指日可待。罗塞塔石碑运回巴黎后,其拓片发送到欧洲各国,掀起了全欧洲破译古埃及圣书字的狂潮。不期,破译竟历时二十三年之久。法国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1790-1832)在接触罗塞塔石的拓片前已精通多国文字,包括埃及的科普特文。他为罗塞塔石耗费了多年心力。商博良比较三种文字,发现希腊文486字,象形文1419

字，差距之大令他疑惑后者不只是表意文字，而是由两种或多种符号构成。他改变了前人拘泥单字的路子，从宏观切入，将石碑上的世俗体翻译成僧侣体，再翻译成象形体，希望如此打通宏观和微观。他先是发现，圣书字用其象形符号表音以拼写外来人名，既而发现表音之用不止于此，终于顿悟。^{[3] (P176, 174)} 商博良在 1922 年 9 月 27 日的学术报告中说“我认为埃及人运用表音符号来书写，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表音符号最初是表意符号里的基本部分。”该报告在 10 月底出版时冠名《就表音象形文字的字母表致达西耶先生信》，从名称即可看出商博良的惊世发现。数年之后他为埃及象形文字下的定义“这是个复杂的书写体系，是同时兼具表意和表音作用的文字。在一段文、一个短句甚至一个字里，都可能同时出现这两种作用的符号。”^{[3] (P160-180)} 商博良先后看过无数的石刻和莎草纸，但他早就放弃了翻译罗塞塔石，他初以为自己拥有的拓片不清晰，后才知罗塞塔石中象形字部分本身就是残破的。但初始激发欧洲学者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确是这块石头，这个世俗故事也多以讹传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而告终。

埃及古文字与中国古文字同起源于象形文字，比较这两种文字的构造方式是本节的旨趣所在。而商博良发现的埃及象形文字兼有的表音功能是我们对比的要点。

首先要比较的是圣书字与古汉字的造型风格。大凡见过这两种文字的人，多会有这样的直观感觉：圣书字具象、写实，古汉字抽象、写意。此非文字成熟度的差异所致，即不是古埃及文字更原始所使然。圣书字从公元前 3000 年问世，至公元 4 世纪终，不像甲骨文、金文很快随新字体（篆、隶、楷）的出现而弃用，在其使用的三千余年中，字符形式基本未变。二者造型的基本风格亦非刻写文字之载体所致，载体均为硬物，前者为石头，后者多为龟甲、牛肩胛骨。此种风格差异甚至从两民族远古时期的陶符中已见端倪。^{[2] (P46-55)} 探讨二者差异之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其产生的后果或许尚有少许想象空间。笔者以为，在日后的自生长，即产生新文字上，写实的文字要弱于写意的文字，因写意的空间大过写实。事实上，甲骨文大约有 3000 个字，

而“埃及文字直到公元前 342 年法老时代结束只需要不多于 400 个字符”。^[1] 世所公认，古埃及文字和古汉字是全世界文字中造型最美的，而二者在审美上各执一端。古埃及文字图文并茂，活灵活现，在审美上先拔头筹。古汉字凭借单调、简朴的线条，在审美上后发制人，构造出一种无法言说的秩序、和谐与神秘。还有一个差异就是，在演化过程中，古埃及圣书字迭床架屋，古汉字却一头扎进方块字的严整模式中。这或许是各自语音的特征所致。文字虽非因记录语言而产生，却不可能不受语音的影响。大多数汉语单音节，一个音素一个意思，毫不枝蔓，这一特征很可能影响到文字造型。

我们接下来的比较是文字构造方式，用中国古代学者的话说就是“造字之本”。而其最初的理论是“六书”。唐兰说，六书是战国末年的文字学理论，西汉大学者刘歆（公元前 50 年 - 公元 23 年）记载六书于其《七略》，《汉书·艺文志》录之，以后被许慎（公元 58 - 117 年）光大，成为汉语世界探讨文字构造的基石。^{[7] (P54-60)} 六书理论问世之时，埃及古文字大约已寿终正寝。或许因为其逝去过早，未给我们留下埃及古文字的当世人对其文字构造方式的解释。但象形文字的演化有若干相通之处，大可从许慎的六书说起：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虽开解析构字（词）法之先河，其中的六种方式却分属两种性质，放在一起，徒生混乱。性质之一是字面的构成，即一个字是某物之形状（象形）、还是其意思（象意）、其指向（指事），其声音（形声）——六书的反思者称之为“体”。性质之二是文字增长、繁衍的手段，即转注和假借——六书的反思者称之为

“用”。就笔者所见，此一反思开端于明代赵古则，他说“四书不足，然后假借以通其声。”杨慎继续这一思路“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万历年间的吴元满几乎明确说出“四体二用”。^[64]以后清代小学家段玉裁在《说文注》中引用其老师戴震“四体二用”之说，《段注说文》的流行令世人以为其说始于戴震。六书可分为体用之论异常深刻，既认识到六书中的两种不同属性，又认识到字不够用，才“假借以通其声”。

现代学者唐兰（1949）进一步反思六书，说“四体”中的“象事”是多余的，大可归在“象形”之中。他提出“三书”：

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7]（P63,61）}

唐兰继承“二用”的认识，他说“转注和假借”是“产生新文字的方法”，故不能认为他完全忽视了文字演变。其实从象形到象意，从这二者到形声，都暗含演进之意味。

但仅暗含演进，不能令热切探讨文字演进的学者满意。陈梦家在唐兰之前就提出了更鲜明的“三书”：象形，声借，形声。他说：文、名、字，代表了三个阶级。文就是形，或曰象形字；名就是声，或曰声借字；字就是形加上声，或曰形声字。^{[10]（P18-21,69-87）}很多后来人批判他扔掉了“象意”，乃至缺少了对文字构成的一些解释力。唐兰在其著作中至少两次提到“完全用图画文字时，除了少数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7]（P62,74）}这是常识，况且陈梦家批评过唐兰的三书，怎么可能不熟知“象意”之重要，他是将“象意”与“象形”合二而一于“象形”之中，其要点在“声借”。如此体会，可以说陈梦家扔掉了六书中的重复、啰嗦，将其精华有机地重组。

笔者以为，上述两家“三书”堪称现代中国文字史上并峙双峰。静态地看一个个汉字，唐兰

的三书皆可解析。而动态地看，汉字演进中最大的革命是“声借”打通了“象形”向着“形声”的转化。唐兰可以说，定型的汉字中已不存在“声借字”，虽然唐本人是识别出最多甲骨文字的几个人之一。陈氏则可以说，声借在甲骨文中已比比皆是，以后汉字是经“声借”而蔚为壮观的。继陈梦家之后，刘又辛划定了汉字三阶段的时限：

象形字阶段……时间下限当在商代甲骨文字以前。……假借字阶段……时间从甲骨文开始到秦朝统一。……形声字阶段，从秦汉到现在。^[8]

什么是声借字？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别字，或曰白字。写出别字不外两个可能。其一，不小心写错了。其二，举个例子说吧，某人识字甚少，带孩子出门前给配偶留言“孩子要看老胡和师子我们去公元了”，其中的胡、师和元，分别是虎、狮、园的别字。这可不是错误，而是手段。一个人识字少只好这么做，一个民族在其文字雏形期也只好这么做。域外进贡了一头中土没有的动物，进贡者称它 shizi，皇家的刀笔吏就写成了“师子”，以后为区别起见，加个偏旁成了“狮子”，“师”即声借，“狮”系形声。声借当然不限于外来物。比如象形字中本无表达自己的那个“我”字，靠象形或象意确实都不好办，刚巧某种武器的象形字与之同音，于是表达武器的“我”被借来指示表达者自己，久而久之，表示武器的“我”同那武器一样废弃了，表达主体“我”惯用至今。^{[10]（P20）}

声借是象形字向前发展的必经之路。象形字一旦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就面临字库太小，捉襟见肘的问题。仅靠象形和象意，极难产生众多的新字。今日识字少者会急中生智写出别字，古人声借便是太好理解的事情了。声借既是象形字发展的通则，便有了我们比较埃及圣书字和中国古文字的可能。

声借当然是借，而不是字义或词义彻底变更，故必定发生一字两用、一字多用的现象。当事人从上下文中判断其字义不会是太难的事情。但对几千年以后的人们则是极高的门坎，所以方显出罗振玉、王国维、商博良之伟大。

圣书字与古汉字在声借上有几大差异。其一，古汉字是“整字”声借。如果不是对照埃及圣书字，整字声借甚至很难被中国人意识到。比如“师”被声借，借的是师 (shi) 的声音，不是其中一部分 (sh) 的声音——似乎当然，岂能例外。但圣书字借的正是“半个字”的声音，即辅音的声借。只借辅音，没有元音，能读懂吗？语言学家告诉我们：

对于大多数语言来说，只标出辅音字母（上）比只标出元音字母（下）要容易辨认多了：

W cn rd cnsnnts , bt nt vwls

e a ea ooa , u o oe

We can read consonnants , but vowels. —

这是以上两行辅音和元音齐备的文字表达。^{[5] (P72)}

其二，圣书字对辅音的借用是固定在某个词汇上面的，比如 读作 t，圣书中当然还有其他词汇以 t 开头，却只从这个词汇借用辅音 t。如此，圣书字中声借的词汇是固定的，数量是确定而有限的。其中借用单辅音 30 个。令中国人费解的是借用的还有双辅音、三辅音。比如从 借到了双辅音 pr，pr 中间插入不同的元音以组成不同的词汇，而加入哪个元音要从上下文中判断。从 借到的是三辅音 spr，可以插入两个元音，道理同上。双辅音和三辅音虽不能说是整字声音的借用，但也绝不是如同单辅音那样最小声音单元的借用。或许由此可以透视出古埃及人未尝不愿“整借”，而只求“分借”，但其每个词汇的发音长短不一，音素数量不等，才有了单辅音、双辅音、三辅音的借用。双辅音、三辅音的存在，说明了古埃及人声借的初衷绝无创造字母去拼写的意图。汉字则不同，它对某声音的借用不固定于某字。甲骨文中存在很多一音多符的情况。

其三，圣书字的辅音声借方式，借词少，有单辅音 30 个，双辅音 136 个，三辅音 73 个，共 239 个。反观汉字，其声借的字太多了。裘锡圭说“从原则上说，汉字里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借用为音符，实际上用作音符的字数数量也很大（古今用作声旁的字超过一千）。同样的字音往往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4] (P13)} 声借来的字少，

每个字的构词量就一定大；声借的字多，每个字的构词量就一定少。据李国英统计，《说文》中有声符 1670 个，构成形声字 8233 个，平均构词量 4.97 个。圣书字的声借辅音共 239 个，构词 5000 多个，平均构词量 20 多个，因双辅音、三辅音构词量较少，单辅音的平均构词量超过 40 个。^{[2] (P115)}

两种声借方式的差异中蕴藏着巨大可能性。事实上，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同为象形字出身的圣书字与古汉字分道扬镳。

六、字母诞生的历史

我们话分两头，分述圣书字与古汉字日后的演变及其外部影响。先说圣书字。

在古埃及，与圣书体同时产生的还有另一种文体：僧书体。两文体完全是同一个体系，只是因为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而字体有别。圣书字多用于神圣事务，多刻写于纪念碑上；僧书字多用于日常事务，多写于纸莎草上。前者求美观，后者求简便，后者是前者的线性简化体。埃及古文字的使用导致了一个簿记员阶层的壮大。这个阶层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相似于殷代的卜人、贞人阶层，而有别于两河流域地位平凡的簿记员。^{[5] (P36.41)} 服侍不同目的，形成两种文体，必定是经簿记员之手的。簿记员阶层在文字实践中利用了声借，而声借反过来也影响到他们的进一步书写。

一种说法是公元前 2200 年左右，埃及簿记员们为了省力，只用辅音字母来书写。^{[5] (P72)} 另一说法是，被王朝派遣到偏远沙漠地带的簿记员的书写能力赶不上中心地的簿记员，加上他们面临很多外籍雇佣兵和劳工的名册登记，故他们开始了只用辅音字母来书写，^{[6] (P134)} 最微妙的契机极可能是名册登记。其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催化簿记员使用辅音字母，不然无法完成外籍人的姓名登记；另一方面，这种书写极大地震惊和刺激了外籍雇佣兵和劳工：埃及人竟然可以用符号书写我们的名字，而且那方法并不艰难。很难想象，还有哪一种书写所构成的刺激，能高过书写一个初见文字者的姓名。

但是只用辅音字母书写只是部分埃及簿记员的部分行为。在堂而皇之的场合，依旧是使用象

形字加辅音声借合成的文字系统。对古埃及人与拼音文字的关系有两种观点:

重理据的汉语结构原理需要对表音的方法进行表意化的改造,使之相互和谐合拍,而古埃及语的圣书字等理应反向发展。对表意的方法进行表音化的改造,使之适应语音与意义无强制性联系的特点,但圣书字等在还没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时候就消亡了。^{[57] (P259)}

德里夫认为腓尼基的字母不可能是在埃及的土壤上发明的,因为它会被“埃及沉重得能压死人的传统、古旧的风俗和有权有势的祭祀们”扼杀在“摇篮里”。^{[58] (P344)}

前一表述(徐通锵)显然包含了他对古埃及人打通他们与拼音文字一层窗纸之隔的主观期待,对两千年都未“实现”的“改造”,我们只能说埃及人其实是缺乏动机的。那时文字没有广泛的用场,圣书字和僧书字大可满足不多的用场,改变它们何所为图?

反观闪米特人,几乎立即接过来埃及文字中的辅音字母。这里不是象形与拼音哪个方法更好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见到了拼音,且学不来象形字。

1993-2004 年,达内尔(John Darnell)在尼罗河系的 Wadi el-Hol 沙漠地带先后实地发掘 13 次,发现了记录闪族话的字母性质符号的岩石铭刻,符号明显带有埃及象形文字的痕迹。这是闪族人借助埃及象形文字形成自己的字母系统的最初印迹。^{[56] (P133-134)}

改造埃及辅音字母后的闪族字母不超过 30 个,当然闪族拼音文字中已经丝毫没有埃及象形文字表意的成分。除了借来辅音字母,他们还借来了埃及文字里面的“限定性符号”,用作闪文中元音发音的提示符号。这就是产生于公元前 16 世纪的“迦南字母”。以后迦南字母传遍中东、地中海沿岸的闪族世界,其中包括北闪米特——腓尼基人。

公元前 1225-1175 年间,赫梯帝国灭亡,非利士人摧毁了爱琴海地区的很多城市,克里特文明从此消失。这之中,只有一套字母表幸存,即腓尼基字母。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腓尼基字母

已经发展完善,其中包括 22 个辅音字母,沿用了一千年后,演变成迦太基文,他们被地中海西岸各地的腓尼基殖民者的后代一直使用到公元三世纪。^{[55] (P76-78)}

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说:

腓尼基人在卡德摩斯王子的带领下来到希腊,他们在希腊定居下来之后,给希腊带来很多新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字书写。我想,这是一种希腊人之前一无所知的艺术。^{[55] (P107)}

近现代史学家大多同意腓尼基字母传至希腊的时间是公元前 850 年左右。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表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良。腓尼基字母表中的一些多余的辅音被希腊人变作元音来使用,这样经希腊人改造过的字母兼备辅音与元音,比此前任何一套文字系统更能忠实地再现口语。因尊重这份礼物,希腊人仍称之为腓尼基字母。希腊人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改革,固然离不开他们的才智和魄力,但更为基础的原因是两种语言的根本差异“腓尼基所有词都以辅音开头,而希腊语中很多词却以元音开头”^{[55] (P112)} 语言存在差距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做出改革,但若其语言与闪族相似,他们极有可能像此前受迦南字母影响的其他民族一样因袭无元音的字母表。现代希伯来文字和阿拉伯文字都是只有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这雄辩地说明,其前身闪族文字只靠辅音字母是不成问题的,那里没有发明元音字母的必要性。

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以后几百年间的埃及,圣书字、僧书字、世俗字和希腊文一同使用,而其中以希腊字母记录埃及语的文件使用得最多,这种使用最终定型为科普特文。古埃及人几乎触摸到了字母,但 239 个单辅音、双辅音、三辅音的并行,无元音在阅读时对理解力的较高要求,都意味着他们没有品尝到字母文字的便利。间接获益于埃及文字的希腊字母,返身一击,竟是哺育了字母文化的圣书字的死亡。亚历山大大帝固然功不可没,但是使用便利是第一成因,乃至在没有亚历山大的时代希腊字母仍然影响了整个欧洲。

希腊字母被借用到意大利半岛,开始了其伟力的最大释放。公元前 753 年罗马人从二传手伊特拉斯坎文学到了字母。公元前一世纪,严整的拉丁字母表产生。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两大力量的扩张,拉丁文成为通行全欧洲的文字。这也使它在一个维度,即其统治的版图内文字与语言的脱节上,超过汉唐宋元明清的东方帝国。且因汉字自殷周一脉相传,它与其帝国内的各地语言毕竟有一定的相关并制约着各地语言的进一步离散。而拉丁文是在公元纪年的前后才开始支配欧洲,它与民族语言的脱节是彻头彻尾的。

一千余年后,当欧洲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后(法文产生于 10 世纪,中古英语起始于 12 世纪,德语产生于 16 世纪),拉丁文被架空,最终成为死文字。

但全部欧洲的民族国家,无一例外地长久沐浴于拉丁文,最终其各自产生的统统是拼音文字。字母最终决定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文字,包括地处远东的越南。

这是理性的胜利吗?不可以这样认识。中国文字的故事我们下面要讲。这里仅指出一点,人类文明的轨迹中充满偶然性,其中当然不乏理性的影响,但它绝不是纯粹理性的设计。拼音文字中的一个缺陷,即字母与音素的分离,算得上这道理的一个注脚。音素即音位,意指语言中的最小语音单位。如果某拼音文字是完美的理性设计,字母应当与音素对应和对等。而实际情况是:英语 26 个字母(5 个元音,21 个辅音),44 个音素(20 个元音,24 个辅音),德语 26 个字母(8 个元音,18 个辅音),42 个音素(19 个元音,23 个辅音)。这种不对等对学习和掌握语言,显然是费力气和不经济的。

我们不能无中生有。自己的语言特征、文化传统、外来文化的借用,当下有限的智慧,共同决定了一项选择。而这个绝非完美的选择很快成为新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我们又必须在其制约下做出下一项选择,而此时我们的智慧依旧极其有限。

七、汉字演绎的过程

对提出古汉字为什么没有走上拼音文字道路的问题,德里达鲜明地认定是目的论,是伪

问题:

这种分析似乎将“语言的语音分析”和表音文字看做一种正常的“结果”,看做一种历史目的。汉字就像驶向港口的船只一样在即将达到目的地时在一定程度上搁浅了。我们可以说汉字系统是一种未完成的字母系统吗?^{[1] (P136)}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则言辞闪烁:

关于汉字为什么既有音标部分而又未能发展成为纯粹拼音文字,这可以举出种种理由。而在汉字没有变成成为纯粹拼音文字而白白浪费时间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了拼音文字化的机会。^[2]

这番言论反映出,一方面宫崎以为可以讲出走不上拼音道路的理由;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觉得汉字曾经有过走上拼音道路的机会。

笔者的惶惑,首先是在这一层面上:什么是伪问题。认定各民族在相互隔绝的地域中也将走上共同的道路,以此为前提追问某一民族为什么未上此路——可称之为伪问题,因为是错误的前提导致了这一问题的提出。各民族的历史选择中包含巨大的偶然性,故走向差异是一定的。但是如果各民族相互间的影响加入进来,就是另一景象。讨论外部影响的可能后果似乎不能说是伪问题。具体而言,讨论似乎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古汉字走的是怎样一条演化的轨迹;其二,汉字的内在特征是否注定了接触到字母拼音文字后仍与之无缘。

汉字的演化轨迹是本节论述的主要内容。汉字与圣书字的分道扬镳发生于声借及其之后。埃及语是多音节,声借的是辅音,用借来的辅音字符拼出一个个新词汇,每个新词汇的区别性在于不同的拼合。某个辅音的声借固定在一个字符上显然要比分摊到多个字符上效率更高。一声多符毫无意义地增加记忆的困难,完全是有害无利。汉语多为单音节,都是整字的声借,没有拼合发生。借来的同一个字,须经阅读者通过上下文意会它所指的是哪个字眼。这样,同一个声借,分散在多个字符上,有抑制区别性过分丢失的作用。下表中的例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述道理。

字音	声借字	形声字
qiu	丘	邱,倏,蚯,坵,簌,觥
	秋	楸,湫,鳅,萩,螯,秋
	求	球,裘,逌,球,洊,毬,楸,殍,盞,綵,萊,蜎,隸
	酋	遁,鰭,嶠,漕,燠,繼,蟪,趙
tong	同	铜,筒,桐,恫,酮,侗,筒,垌,炯,峒,响,尙,炯,痾,炯,桐,洞,飼,銅,詞,銅,桐
	童	瞳,潼,潼,潼,腫,氈,潼,潼,潼,種,腫
	甬	通,桶,痛,捅,桶,筩
ming	名	茗,铭,洺,铭,酪,詔,佖,铭,略
	冥	螟,螟,鄢,溟,暝,螟,莫,溟,黽,螟,螟

我们选择上面三组声借中的一组 tong 来分析。如果在声借 tong 时只选用“同”这一个字，而不是将 tong 的声借分摊到“同”“童”“甬”上面，那么即使只涉及常用字，则“同”可能被借用到 12 种意义上：铜，筒，桐，恫，酮，瞳，潼，潼，通，桶，痛，捅，阅读时要确定“同”代指的是哪个意思便非常吃力。若声借 tong 时用三个字来分摊，比如阅读时看到了“同”，可能代指的是：铜，筒，桐，恫，酮；看到了“童”，可能代指的是：瞳，潼，潼；看到“甬”，可能代指的是：通，桶，痛，捅，选择范围均在 3 - 5 字之间。“即一声多符”方便了阅读时对声借字此处所指的判断。

当汉语的特征决定了我们“一声多符”的声借策略时，我们已经和字母的逻辑拉开了距离。

虽然努力增加一些区别性，即可以在声借时“一声多符”，但声借后区分性与识别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毕竟频繁出现了一字多义，一形多义，形义脱节的现象。为了解决一形多义丧失区别性的问题，古人选择了为声借字加上形符（或曰义符）的手段，于是形声字出现了。

象形成为人类书写的初始手段既是不争的事实，也很好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象形有广谱的表达力，乃至如前所述：图画文字的时代少数是

象形字，多数是象意字。但象形和象意合在一起，依旧有盲点，在表达力上弱于有着远为长久的进化历史的口语。于是只好倚重声借。声借可用于任意的字眼，但汉语单音节的特征导致其识别性的天然弱点，这弱点要靠加上形符或义符来弥补，便有了形声字的激增。《说文》中的九千多字中，形声字占了八成以上。形声字比重虽大，但“声符能准确为形声字表音者少得可怜”。周有光在其《汉字声旁读音便查》（1980）一文中指出：以 1979 年的《新华字典》为据，现代汉字中声符的有效表音率为 39%，这还没有、当然也不该包括对音调的区分。^[4] 时与空均为声符失效的缘由，漫长的时间之流产生了发声变异，广袤的地理之域形成了语音不一。

如果说声借距离字母不远的话，汉字的声借策略——一声多符，是其构字法背离字母的第一步。声借迈向形声——一个声借字转化为多个形声字，令其距离字母已经相当遥远了。当形声字中半数以上已发生音变，便意味着声借时代的“童贞”已失，与字母间曾经潜在的一丝恋爱的可能已不复存在。

以上是汉字演化的历史脉络，历史走向从来都包含着巨大的偶然性。埃及的圣书字曾经与字母只有一纸之隔，其语言的特征与其辅音字母的发扬者无异，自身却未能迈上拼音之路，借助马其顿统治才皈依拼音文字。汉字的不同在于，除了历史的偶然性，汉语自身的两大特征——单音节、声调语，决定了它极难走上拼音文字的道路。所谓单音节是指每个字含一个音节和一个字义。唐兰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汉语中三音节以上的词语不常有，双音节词语相当多。他举例说，如外来语“葡萄”，本土语“参差”“窈窕”等。^{[7] (P20-37)} 笔者同意汉语中含双音节语，其中的单字不构成语义，但仍认为，汉语中的单音节语大大多于双音节语。声调语的意思是我们的每个音有四声：平、上、去、入，或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同音字以声调不同决定其各自的词义。因拼音中不含声调，以拼音表达汉字理解起来将很吃力，如果拼音须加音调将极其麻烦，并且是双重麻烦，标注起来麻烦，阅读中判断仍有麻烦。计算机录入汉字中拼音输入法至今无法突破此一屏障。

汉字独步于世界文字之林，其三大特征均独一无二。其一，他覆盖了最大的地域与人口。其二，它是唯一的活化石，穿越了三千余年的时间隧道，今日中国人可以按最初的形式阅读《左传》《论语》。其三，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革命发生之前，这是与自己的语言系统隔膜最大的文字系统。拉丁文曾经有过相似的隔膜，但那是源于异族征服，非其母语之地创造出来的文字系统，且其历史较汉字短暂得多。正是汉字背离语言的独立性，挑战着近代西方狭隘的文字观，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文字、语言与文明史。

与语言的自然进化相异，文字从来是人为的，它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工具。如上所述，契文、甲骨文均产生于王权，拉丁文的盛衰亦源自权力。汉字的命运与特征均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力结构有不解之缘。掌握着某种文字的政权扩张到哪里，它的文字就能走到哪里。此诚所谓文治武功之特殊意味。并且在古代的传播中，一种文字覆盖地域与人口之大小多寡将极大地形塑该文字的特征。殷代近二百年间创造出的甲骨文能成为汉字的基石，而未随风而逝，直接原因是西周王朝取代殷王朝后，文字上不另起炉灶，而是忠实地继承殷代文字。周公设计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和严谨的封建制。虽行分制，各个封国中的史官却是周天子派遣，故在一个分封的国度中，文字高度一致。自东周至春秋战国，分裂500年的历史中，文字渐生变异。在其行将分化破碎之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并立即实施书同文。以后汉代继承秦制，其管理与文牒高度结合，汉代的文武官员将汉字带到其管辖之地。

汉字文体的演变，既受权力的左右，又同书写工具的演变相关联。秦始皇将文字定于李斯所创小篆。小篆华丽美观，但撰写吃力。庞大官吏系统中的寻常刀笔吏哪有那份造詣、耐心和雅兴，故秦代官僚程邈创隶书，即“臣隶”使用的文体。以后篆字便专属秦皇帝，从皇家下放之后专用于碑额，终不坠其高贵地位。汉代纸张的发明，为文字开拓了宽阔的平台。纸张、毛笔合成的书写方式导致楷书字体的流行。没有纸张，推行科举是不可思议的，而隋唐科举一兴，汉字的繁荣便达同期世界之巅峰。

与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巨大影响相比较，

汉字的影响很小。

高棉文（柬埔寨文字）、泰国文、缅甸文均为拼音文字，都是随着7-12世纪婆罗门教的进入而受到婆罗米字母的影响，而婆罗米字母与腓尼基字母有一定渊源，是产生于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公元前187年）的字母系统。梵文最初就是用婆罗米字母书写，公元4世纪、6世纪又转用其他文体。泰文于1283年确立。高棉文的产生时间相仿佛。老挝文的字母源自高棉文。

东南亚国家中唯一曾受到汉字深刻影响的是越南。越南语与汉语共享单音节和声调语的特征。汉字于公元186年传入越南。^{[15] (P167)} 由于长期的宗主国关系，不仅以汉字为其国家文字，而且汉语也曾经是越南的第二语言。1174年越南确立汉字为越南政府唯一使用的文字。14世纪越南人利用汉字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喃字。他们为喃字取代汉字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如创造文学作品，将《论语》等中国经典译成喃字。但17世纪越南沦为法属殖民地，令喃字早夭。以后他们用法文字母拼写本国语言。越南人如何克服单音节、声调语与拼音文字的冲突，应该成为中国语言学家关注的课题。

朝鲜语是粘着语，与汉语差距很大。但由于与中国接壤，且与中国中心地较近，朝鲜受汉字影响很大。迄今发现的最早使用汉字书写朝鲜语的碑刻是公元414年。^{[15] (P168)} 利用汉字书写朝鲜语称为“吏文”，因两种语言的差距，吏文的书写非常吃力。15世纪朝鲜成功创造出本国文字，皇家为此颁布诏书“训民正音”（1446）。这是一种易掌握、优势大的拼音文字，有学者认为，谚文的产生受到藏传佛教萨迦派五代祖师八思巴于1269年帮助创造的蒙古文字（亦称“八思巴文”）的影响，或受南亚文字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外来语，最初在谚文中仍保留其汉字的面貌。在金日成时代统统去除。^[16]

日本接受汉字是从朝鲜转手。但日本成为我们周边唯一受到汉文化与汉字的影响，最终未走上拼音文字的国家。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日本为汉字向日文的转化付出了巨大努力，且日本与朝鲜、越南、东南亚诸国相比，人口多、文化发达、识字阶层庞大。这一阶层深深陷入汉文化及

脱胎于汉字的日文中。乃至在日后接触到拼音文字时，不肯更大地改造已经积淀了巨大本土文化基因的日文。

汉字在周边的影响力显然弱于远道而来的拼音文字，原因异常简单：利用字母拼写自己的口语容易，利用汉字形成自己的文字艰难。如果没有字母的影响，他们只好将汉字与其口语结合，而在文化积淀尚不丰厚时接触到字母，便趋易避难了。但日本的例子是生动的。当你的文字已经同你的历史、文化密切结合时，一方面改换门庭代价巨大，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也一定会上升。

八、论辩与文字

在古代历史中，希腊与中国是对人类文明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两个民族。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字也分别位于人类书写谱系之两端。一端是硕果仅存、传递和发展了三千余年仍生机勃勃的形声文字，另一端是兼备元音辅音、直接或间接被大半个世界效仿的古希腊字母文字。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字是否深刻地影响了两个民族、乃至中西方大异其趣的哲学、艺术、科技，是本节旨趣所在。在形声与拼音文字对思维和文化的影响上，笔者见识过三种看法。

其一是“不同文字的大脑加工方式”。一些学者认为：拼音文字主要由左脑来加工，汉字兼有形和声，故左脑加工语音，右脑司职图像，即拼音文字是单脑文字，因汉字开发了复脑，在提升思维能力上别居优势。临床病例分析显示，中西方患有阅读障碍的病人中，右脑受伤者的比例相仿，都在 4% 左右。其他实验也不支持汉语更多使用右脑。沈孟坤雅的结论是：汉字认读与字母文字的认读建立在同样的阅读机制上。^[41]

其二是“文字抽象能力”。曹念明认为：

自创文字中最早使用的“象形”造字法只能模拟有形可象的指称物，而对于无形可象的抽象概念显得力不从心；诉之于听觉的口语能够创制出表达纯抽象的语词。……运用汉字的中国人，在西方学术文化输入之前，几乎不能掌握纯抽象的概念。……正因为汉字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合一的，而西方表音文字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客

二分、主体指导的。所以导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产生了非常鲜明的差异。^{[1] (P102, 132-133)}

此说的致命弱点是，汉字固然源于象形，却自商周、秦汉就进入了声借和形声的时代，其语音早就进入文字中。笔者不敢说中国古代哲人的抽象能力可以比肩古希腊哲人，但若深究抽象能力的差别，恐须另寻原因。

第三种说法是本节的主题：辩论与书写。笔者是受曹念明著作（2006）的启发而思考此一命题的，最终认为西方重辩论与演讲、中国重文章与背诵的倾向贯穿古今。且从古代说起。

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几乎在其立法与哲学发轫之时就勃然兴起。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公元前 624-547 年）和完成雅典宪法改革的梭伦（公元前 638-559 年）都赞同自由辩论的原则。古希腊科学史研究者劳埃德说：

米利都人（此地孕育了古希腊第一个哲学派别，泰勒斯为这一学派的创立者——笔者注）的贡献的实质是，在人对于自然世界的态度中引进了新的批判精神，这应该视为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环境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这一进展的对应物，或者看作是这一进展的产物。^{[42] (P13)}

论辩极盛于智者时代。

智者是新运动的代表。智者这个词原来指聪明而有才能的人而言，但是在这个时期它指的是职业教师。他们周游各地，收费教授思维和辩论术，为青年人从事政治生活作好准备。^{[43] (P44)}

智者同上个时代，即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的差别是，从前辈天真无畏的求索转变为对人类认识能力和普遍知识的怀疑，从而开启了思辨和认识论；在其教学和交流中开创了对话体；但因丧失了追求真理的信心，一部分智者转而痴迷于演讲和辩论的胜利，以求赢得更多学生和教学的收入。

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377 年），基本不涉足同时代智者们的争论，故其著作中不经意地说及当时社会上的演讲与辩论，便具有了更大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可惜过于支离、简约：

有人听惯了演讲者讨论与医学无关的人性，对我的讲话将会一点也不感兴趣。……对同样的听众辩论同样的题目，每个参加辩论者从来不会连胜三次。这一次是这个人取胜，下一次换了另一个人，第三次又是一个人在听众面前以口才取胜。如果一个人的知识是真正的而且他能正确地表达出来，那么正常的情况是他在争论中应一直是胜者。不过，依我看，这些人由于一知半解在讨论中自相矛盾，结果确立了麦利苏斯（melissus）的理论。^[4]（P208）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在其对话体著作《智者》（公元前357年）中以一个巴门尼德追随者的口吻讲述智者群体的生活：

论战也应当设定为两种。其中一个，当论战发生在公开场合，涉及正义与不正义，而且表现为长篇大论与长篇大论的对抗，这就是“法庭讼辩”。另一个则相反，它在私下场合里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分段进行。除了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争论术”之外没有别的名称吧？

我们知道不仅智者自己精通于争论，而且能使其它人也如他们那样做到这点。……智者通过某种方式能使年轻人产生这样的意见，亦即关于一切东西他们在所有人中“是”最智慧的。很明显，如果他们的争论不正确，对年轻人也“表现为”不正确，或者，就算他们“表现为”正确的，但是他们的论战对于年轻人并不“看似”更有智慧，那么就会如你所说，几乎没有人愿意付钱给这些人并成为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学生。……我想，因为他们“看似”在所争论的这些东​​西上拥有知识。我们说，关于一切，他们都这么争论。所以，关于一切，他们对学生们都“表现为”智慧的。^[5]（357BC, P18-19, 31-32）

古希腊哲学史专家这样看待智者运动的负面：

这里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那就是形式简直要盖过内容。雄辩术要窒息追求真理的感情。智者学说不仅以其哲学的怀疑主义使人们怀疑科学的可能性，而且以其相对主

义理论及其某些成员彻底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国家和家庭现存的权威。它所提出的问题超过了它所解决的问题。^[6]（P102）

正是在古希腊哲学遭遇重大危机的关头，苏格拉底出场了。他在保持怀疑精神的同时，怀抱着对真理与正义的充沛信心。尽管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其尖刻的笔调批判智者，究其实质，二人与智者共享很多东西：从自然哲学转向人的研究，怀疑精神，酷爱对话与论辩，等等。柏拉图的著作基本上是记述苏格拉底与各色人等的对话，其小部分是写实，大部分是柏拉图继承此种风格，借老师之口讲述自己的心得。

柏拉图哲学的方法的主要特色是用辩证法去探求知识。……辩证法，顾名思义，起初是指论辩的艺术，后来成为以问答方式发展科学知识的技术。^[6]（P140, 141）

与高度重视论辩和对话相对应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表达出令后人惊讶的对文字的蔑视。柏拉图从20岁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斐德若篇》写于其27岁，也是苏格拉底被审判处死的前一年，因而有理由认为该文比较真实地记述了苏格拉底的言论。《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表达出他对文字的三重看法。其一，文字不是帮助人们记忆，而是使人们善忘。其二，文字给学生们的“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其三，也是笔者以为最重要的：

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7]（400BC）

这确乎是文字比之对话与辩论的劣势之处，更是苏格拉底教育学的精髓所在。长久尽享这一甜头的希腊公民及其文化传人，自然珍爱而不肯丢弃这一提升与检验智慧的利器，它绝非阅读和背诵所能顶替。乃至论辩的传统穿越时间的隧

道，存活在今天西方的学术与教育领地。选拔学生必经口试，因为一段默写说明不了什么，大而化之的笔试解答依然不能证明一个考生的分析能力。《斐德若篇》成文 2200 年后的西方哲学家约翰·密尔在其《论自由》中透彻地告诉我们，“讨论”在智力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伟大功能：

就假定真确意见是深踞心中，但系作为一个成见、一个脱离论证的信条、一个反对论证的证据而深踞心中——这也不是一个理性动物主持真理时所应采取的办法。这不是有知于真理。这样主持下的真理，毋宁说只是一个迷信，偶然贴在宣告真理的字面上罢了。……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是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其精华则已尽失去了。^{[48] (P37,41)}

《第 7 封信》（公元前 354 年）是柏拉图 70 岁时所写，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两重意思。其一，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大胆地将其理性思考诉诸文字。其二，也是笔者更看重的：

然而，我并不认为把这些事情告诉人们是一件好事，除非是在少数人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能力稍加指导就能独立地去发现真理。^{[49] (354BC)}

对象多少无疑是选择表达方式的根据。而这选择中，空间要比时间更切近，当下要比未来更要紧。对哲学与科学的思考，没必要也不可能传递给众人，毫无疑问只属于一小撮怪物。而希腊的城邦制，其政治民主与法律生活，加上周边人才被吸引到雅典，都使对话成为希腊哲人最佳的表达方式。有需要和能力听取某人的某个观点，大多可以在会晤、聆听和争辩中实现。这样的交流和切磋当然非“读死书”所能比拟。

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看某人是否践行所言。但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中，一个思想复杂的个体常常是人格分裂的，故对一个诚挚的哲人，观其行是判断其言论后面的情感及价值观的门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是人格分裂

的。苏格拉底贬低文字，但自己并非不阅读。人格分裂最甚者是柏拉图。上述贬低书写的文章均出自他的手笔，而他的写作生涯长达 50 年。

只有很少几个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只有柏拉图一个人的著作保存下来，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早期的著作都已佚失。^{[46] (P12)}

在其当下，柏拉图明言自己更看重的是对话，但毕竟会念及外邦和后人，于是书写这门新技术就不可能不牵着他走。而一个伟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贡献正在于，面对不可一世、无法抗拒的新技术，他能冷静地意识到希腊哲人传递到柏拉图时已近两百年的论辩、对话传统的伟大功能，从而捍卫和坚守论辩、对话，达成了口语与文字的罕见的和谐，正是此种和谐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希腊文明。

下面转论中国古代哲人。他们中的多数人轻视乃至蔑视口才和论辩。以下语录取自轴心时代的典籍。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曰：其言也讷，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论语》12 章 3 节。意思是：司马牛问仁德。孔子答：仁者言语迟钝。司马牛又问：言语迟钝就是仁吗？孔子说：做起来不容易，说话能不迟钝吗？）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13 章 27 节）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4 章 24 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1 章 3 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道德经》81 章）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意思是：天地四方宇宙之外的事，圣人总是存而不论；宇宙之内的事，圣

人虽然细加研究，却不随意评说。至于古代历史上善于治理社会的前代君王们的记载，圣人虽然有所评说却不争辩。可知有分别就因为存在不能分别，有争辩也就因为存在不能辩驳。有人会说，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把事物都囊括于胸、容藏于己，而一般人则争辩不休夸耀于外，所以说，大凡争辩，总因为有自己所看不见的一面。）

诸子百家时代洋洋大观的怪杰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好辩之徒。庄子与惠施的“知鱼乐”便是美谈。但是惠施死后庄周这样说：楚国一个木匠在其朋友鼻子上涂一点石灰，拿起斧头风一般砍去，刚好砍掉石灰，而鼻子一点不伤。后有人请他表演时他说：伙伴死了，不再表演了。庄周接着说：现在惠子死了，我没有对手了，没有对话的人了（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如果想到孔子的“有教无类”，领教过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有辩无类”，不难意识到庄子参与辩论的偶然与偏狭。晚庄子一两代人的荀况在看待那位隔代人惠施时，竟刻薄如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还有比惠施更好辩的公孙龙，其招牌语是“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而可以同惠施辩说的庄子在评价公孙龙的“离坚白”时，编造老聃的口吻说“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庄子·天地》。意思是：这是小的技术，只能使人身心疲劳。）从此一案例看，庄子对待辩者与荀况同样刻薄。

不是说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善辩吗？其实他们的目的在于说服君主，儒法两家同样怀此意愿。而说服君主与驳倒论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倚重的是心计、卖点、洞察君主性格，等等，绝非逻辑缜密、善察对手破绽。其原因很简单，政治场域有别，人才买主不同。君主政治与城邦民主怎么可能以同一方式影响观念供应者们呢？

接下来看中国古代哲人对文字的态度。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7章25节）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12章24节）

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5章22节。意思是：我们那里的学生们志向高大，文采斐然，我不知道怎样去指导他们）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1章6节）

诸子留下的著作数量在同期世界上几无匹敌，不是因为春秋战国之际有十余位超级作家。很可能作者并无作品这般卓越，但门下的弟子写手却远比“诸子”数量庞大。冯友兰说：

称为先秦某子的书都是某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虽号称为某子，但并不肯定其中某些篇是某子所自著的，更不肯定全书都是某子所自著的。这个见解，章学诚讲得很清楚。……题为某子，意思不过是说，这是以某子为首的某一个流派的人所作的文章。^{[50] (P107,358)}

比之古希腊智者崇尚辩论，中国古代哲人更热衷于将主张结晶为文字，为本派赢得生前身后名。作品的优异，作者群的庞大，无疑都证明着中国古人对文章的高度重视。

中国自轴心时代便有重文章轻辩论的倾向，经公元7世纪科举制的确立，达到固化。李弘祺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科举考试制度到隋代才开始，这时笔试被正式采纳。在此之前选拔官吏的方法也许是依靠面试。尽管如此，口述从未系统被使用过。……笔试的好处是候选人与考官互不见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见面口试或论辩还公正一些，保持一定程度的公平。这一种维护公正、公开过程的努力是中国的一项发明。……这就和几乎所有的其它主要文明不同。……唐代以后，中国人没有在任何的面试和辩论上面做出什么贡献。……公元10世纪以后，演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中国学者从宋代以后，已经不再重视举办大型的演讲，更不重视雄辩的技巧。……中国的贵族教育始终缺乏对讨论或辩论的兴趣。……中国人毋宁说是一个不

断要避免正面冲突的民族，他们尤其不喜欢在口头上产生冲突，也因此口试及辩论就不是他们做学问的长处。^[5]

在西方重辩论、中国重文字的文化差距中，当然包含着后生的因素，比如中国的科举制，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辩论，但中国与希腊的风格自源头就是有别的。早期的因素亦是不一而足。帝国的治理依赖文牒，文字克服了口语传递中信息的衰减变形，更不必说方言音异的障碍。城邦中的交流当推口语最便捷，一次演讲足令城邦内所有关注者尽悉详情。而与本文密切关联的一个因素绝不可以轻视，就是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的差异。曹念明说：

事实上，凡是有自源型本民族自制文字的民族，都把文字的地位、作用放在口语之上。只是在希腊，由于是借用外族的文字来记录本族的口语，所以才把文字放在口语的附属物的地位。^{[1] (P164)}

此为洞见。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为何使用自源型文字的民族更重视文字？笔者以为，是因为源自象形的文字神秘、难掌握、门槛高，三者辐辏，造就出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高贵。反观拼音文字，其特征是易掌握、门槛低，故很难令其使

用者有特权的感受。此为中国、希腊文化特征的分野之始。

其后，古代中国，希腊，乃至各民族，在发掘文字潜力上只有先后之别，鲜有不致力于此者。倒是在口语的开发上古希腊人独辟蹊径，演绎出辩论、演讲、对话的大戏。这首先是人口规模与政治体制这双重因素，即所谓城邦民主政治所使然。这一“游戏”需要辩论与演讲，且后者是此一时空下的最佳表达手段。而政治生活中的表达利器迅速移植到思想活动和教育领地中。口语的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使用形声文字的民族，当然绝难有这一开发。而在字母文化的民族中，希腊也是唯一深度发掘辩论、对话与演讲的民族。

没有文字是不可能希腊文明的，但是没有口语潜力的深度开发，同样不会有伟大的希腊文明。微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当然前者要借助后者的刀笔。宏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

窃以为，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都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注：出版年的“/”前为原著出版年，其后为译作出版年。）

- [1] 曹念明. 文字哲学 [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2] [德] 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 [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 [3] [法] 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 论文字学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67/1999.
- [4] [法] 卢梭. 论语言的起源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5] [美] J. 卡勒著，张景智译. 索绪尔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6/1989.
- [6] [瑞士]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7] 唐兰. 中国文字史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49/2013.
- [8] [新西兰] 费希尔著，崔存明、胡红伟译. 语言的

- 历史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012.
- [9]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 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10] 陈梦家. 中国文字学 [M]. 北京：中华书局，1939.
- [11] 徐中舒. 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 [C] // 徐中舒. 先秦史十讲. 北京：中华书局，1981/2009.
- [12] 张光直. 商代文明 [M]. 北京：中国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
- [13] 裘锡圭. 究竟是不是文字 [C] // 裘锡圭. 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字学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012.
- [14] 裘锡圭.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 [J]. 中国语文，1978（1-4）.
- [15] [新西兰] 费希尔著，李华田、李国玉、杨玉婉

- 译. 书写的历史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2012.
- [16] 库尔马斯. 东亚书面语言的功能和地位 [C] // 黄亚平、白瑞斯、王霄冰编. 广义文字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 [17] [法] 勒内·格鲁塞著, 蓝琪译, 项英杰校. 草原帝国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18]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1980.
- [19] 宋镇豪. 再谈殷墟卜用甲骨的来源 [C] // 《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 三代文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20] 刘一曼. 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及其相关问题 [J]. 考古, 1997 (5).
- [21] 董作宾. 甲骨学五十年 [M]. 台湾: 艺文印书馆, 1955.
- [22] 傅罗文. 贞人: 关于早期中国施灼占卜起源与发展的一些考虑 [C] // 荆志淳, 唐际根, [日] 高楠谦一编. 多维视域: 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23] [美] 艾兰著, 汪涛译. 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4] 马如森. 殷墟甲骨学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 [25] [日] 藤枝晃著, 李运博译. 汉字文化史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26] 饶宗颐.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C] // 饶宗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9/2009.
- [27] 李学勤, 彭裕商.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28] 宋镇豪, 刘源.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 [29] 饶宗颐. 贞人问题与坑位 [C] // 饶宗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2009.
- [30] [日] 伊藤道治. 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1] 亨利·乔治·弗斯科尔. 埃及文字的起源 [C] // 黄亚平, 白瑞斯, 王霄冰编. 广义文字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 [32] 陈永生. 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3] [英] 莱斯利, [英] 罗伊·亚克斯著, 黄中宪译. 破解古埃及: 一场激烈的智力游戏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 [34] 李芳芳. “四体二用”说倡始者再认识 [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8 (3).
- [35] 刘又辛. 论假借 [C] // 刘又辛. 文字训诂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36] 王明嘉. 字母的诞生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 [37] 徐通锵.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 [C] // 黄亚平, 白瑞斯, 王霄冰编. 广义文字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 [38] 古迪, 沃特. 文字的社会功能 [C] // 黄亚平, 白瑞斯, 王霄冰编. 广义文字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 [39] [日] 宫崎市定. 中国文化的本质 [C] // [日] 宫崎市定著,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新翻译组编译. 宫崎市定论文集 (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1965.
- [40] 陈舒眉. 形声字与汉族的表音趋向 [J]. 语文建设, 1993 (8).
- [41] 沈孟坤雅. 心理语言学中汉字认读的几个观点 [C] // 黄亚平, 白瑞斯, 王霄冰编. 广义文字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 [42] [英] 劳埃德. 早期希腊科学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70/2004.
- [43] [美] 梯利著, 葛力译. 西方哲学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4/1995.
- [44] [古希腊] 希波克拉底著, 赵洪钧、武鹏译, 徐维廉、马堪温校. 希波克拉底文集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 [45] [古希腊] 柏拉图. 智者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46] [德] 策勒尔. 古希腊哲学史纲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980/2007.
- [47] [古希腊] 柏拉图. 斐德若篇 [C]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文艺对话录.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 [48] [英] 密尔著, 程崇华译. 论自由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49] [古希腊] 柏拉图. 第7封信 [C]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50]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51] 李弘祺. 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 [C] // 刘海峰主编. 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参考文献:

- [1] 江淹. 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 (1925) [J] // 陈望道. 陈望道全集 (第一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2] 何丹, 方柯. 汉语文化学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 [3] 德 莱布尼茨. 人类理智新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4]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5] 饶宗颐. 说筮 [J] // 饶宗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6] 吴浩坤, 潘悠. 中国甲骨学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7]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解释篇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8] (西汉) 杨雄. 法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9]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The Origin of Writing

ZHENG Ye-f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writing, analyses the definitions made by Aristotle and Yang Xiong, a Chinese scholar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is regard between Leibniz – Derrida and Saussure. The philological conceptions of Tang Lan, Chen Mengjia are also analyzed.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inscription on pottery are not writing, refuting the argument that writing originates from conventionality, and pointing out that it is none other than the state power as a part of the social system that initiates writing. Subsequentl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assumption on clay token as explain the origin of writing in the Valley of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positing that economic need does not constitute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writing, th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re the prime motivator.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Sh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the “group of augurs”, the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incubation of writing might take a long period and a shorter one; during the former period multiple visual symbols including inscription on pottery emerge, and the latter marks the initial stage of writing system.” In the paper the different ways of constitution of the Egyptian hieroglyphic writing and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examined in comparison; also investigated in particular 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odes of sound borrowed words, and why the origin of alphabetic writing is triggered off by the Egyptian hieroglyphic writing. The paper expounds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e Greek alphabet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s, concluding that, in both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terms, it was, is and will be crucially important to put equal emphasis on oral expression and writing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mankind.

Keywords: origin of writing; clay token; devine specialists; sound borrowed words; alphabet